

日本产业的“革故鼎新”

——日本专题研究系列六

报告日期：2024年8月26日

证券分析师：徐超

电话：18311057693

E-MALL：xuchao@tpyzq.com

执业资格证书编码：S1190521050001

证券分析师：万琦

电话：18702133638

E-MALL：wanq@tpyzq.com

执业资格证书编码：S1190524070001

目录

1

产业结构的升级

2

产业政策的演变

3

产业的对外转移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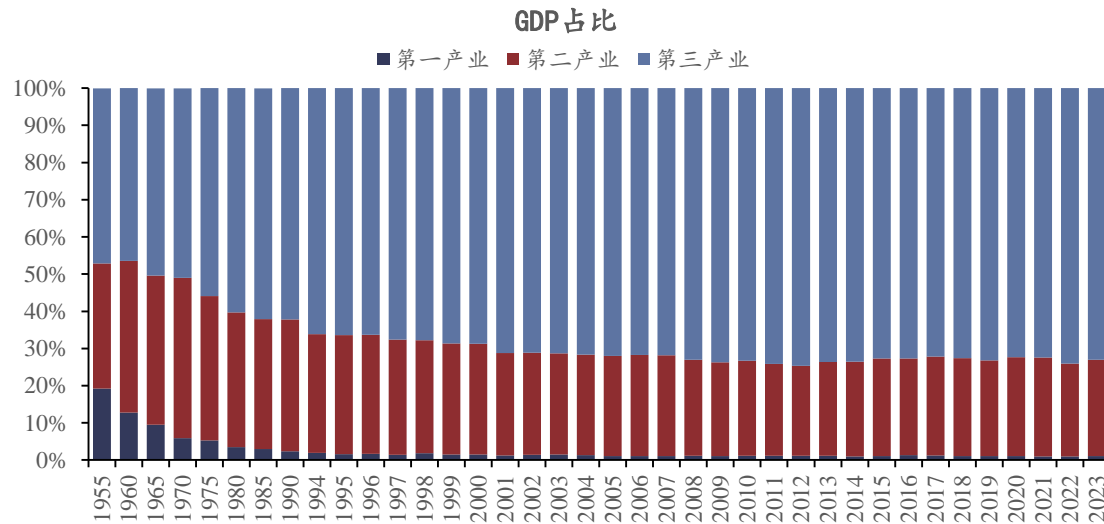
产业结构升级与转移中的困境

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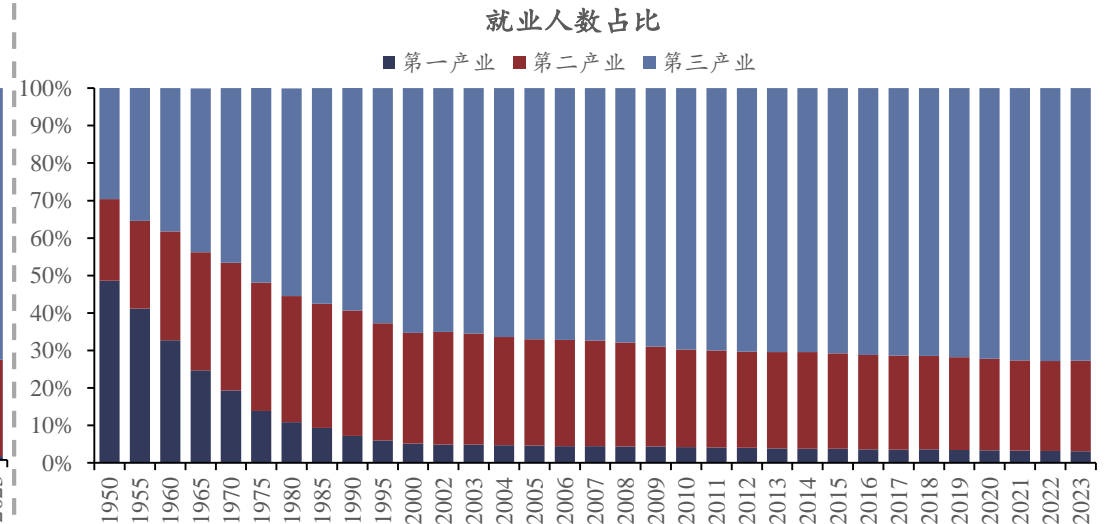
产业结构的升级

日本产业结构几多变迁

- ▶ 在内部产业政策及外部贸易摩擦、汇率升值等因素的影响下，战后日本产业结构出现显著调整。其结构转换速度之快、幅度之大使得日本相比其他经济体，形成了独具一格的产业转型经验。从形式上看，日本产业结构的变化既包括生产要素在不同产业之间的流动，也涉及产业内部各企业之间的资源再分配，这一方面在对内产业的升级上得到体现，另一方面在对外产能的转移中也有所反映。而历经产业的多次转型，日本最终也在诸多高附加值行业确立了全球领先的地位。
- ▶ 日本产业的转型遵循以下轨迹：不同产业之间，生产与就业由农业转向制造业再向服务业迁移；制造业内部，资源首先集中于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后逐渐转向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再转移至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的高附加值工业产业。



资料来源：Wind，日本统计局，太平洋证券研究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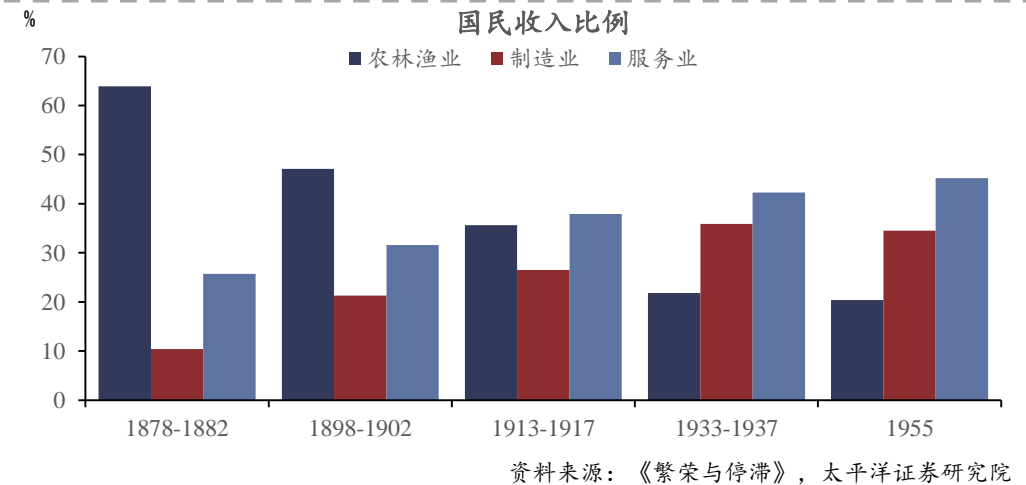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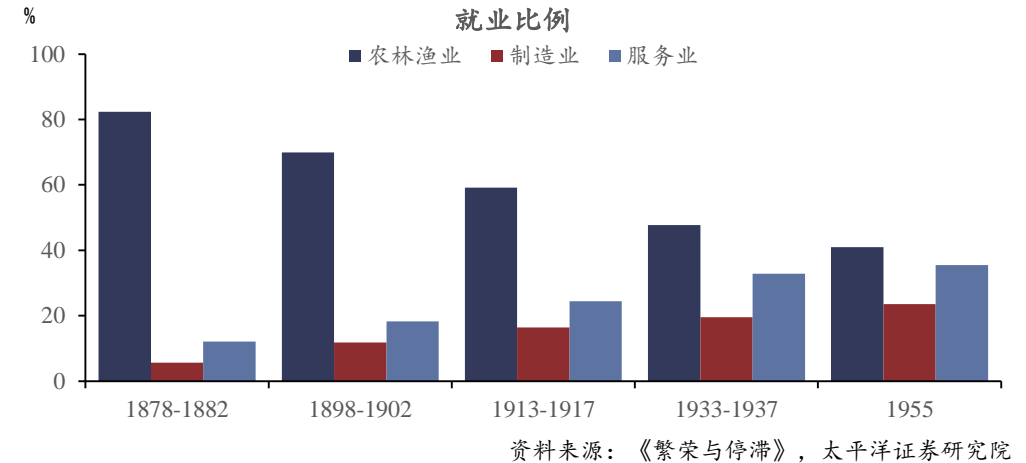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Wind，日本统计局，太平洋证券研究院

01

产业结构的升级

日本产业结构几多变迁

- 20世纪40年代中期 - 50年代中期，战后恢复期，轻工业占主导，原材料重工业开始发力。
- 二战结束前日本产业结构以第一产业为主，无论是就业比例还是国民收入份额，第一产业均占据相当大的比重。而随着战后日本经济重建的开启，产业结构也出现了一定调整。第一产业对于经济的支撑逐渐走弱，而第二产业所占比重及其对劳动力的吸纳效应则有所提升。
- 一方面劳动密集型轻工业主导战后经济恢复。二战导致日本经济严重受损，工业生产也遭受大规模破坏。为实现战后经济复兴，日本将纺织纤维产业视为关键。一则该产业自明治时代起便是日本的基础产业，也是外汇赚取的重要渠道；二则二战后和平年代市场对于以衣物为代表的轻工业品的需求增加；三则从生产端的角度看，战争时期从事军事工业的企业转向生产轻工消费品，推动了劳动密集型轻工业的发展。
- 另一方面优先将原材料和资金配置到重点行业。鉴于资金、生产能力、物资等方面的欠缺，日本政府决定以煤炭以及钢铁等重点行业的生产为优先。日本对于原材料重工业的偏重既是为了助力经济走出战后阴霾，也是出于融入国际经济体系、提升国际地位的长久考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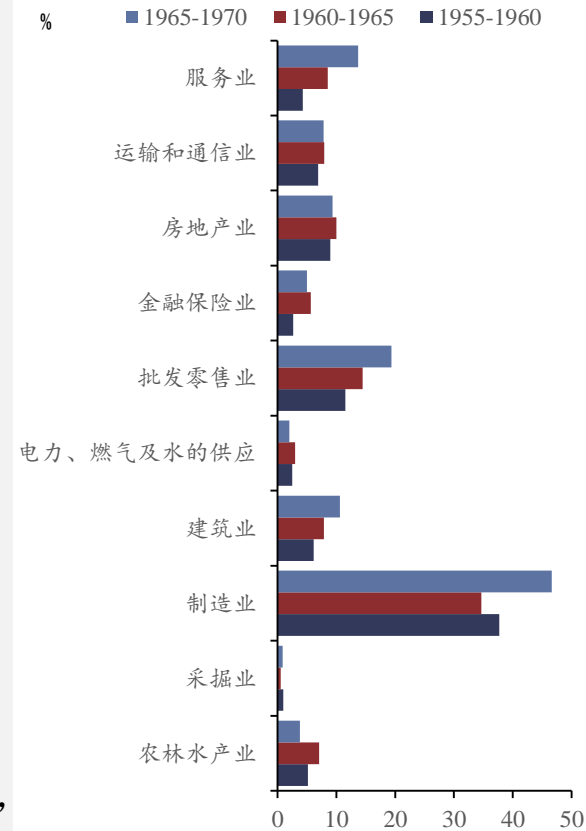
01

产业结构的升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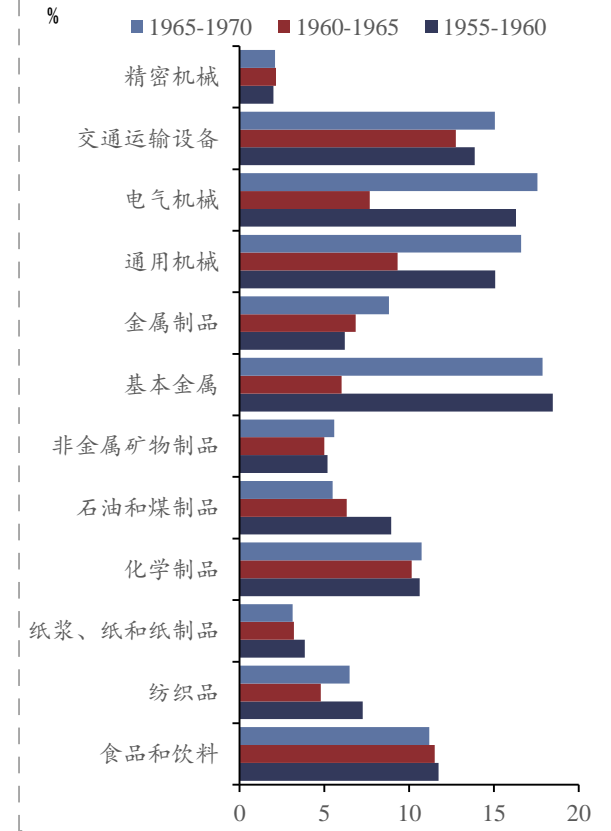
日本产业结构几多变迁

- 20世纪50年代中期 - 70年代，高速发展期，重化工业为核心。
- 经过近十年的战后恢复，日本迈向经济腾飞和奇迹阶段。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以重化工业为核心的产业体系逐渐形成，钢铁、石油化工与机械等行业先后成为核心产业。1960至1970年间，日本重化工业对名义GDP的贡献率上升近2倍。1970年日本重化工业品出口在总出口比例超七成。1974年，第一产业占名义GDP比重大幅下降到5%左右，第二产业占比则提高至40%以上。
- 这一结构的确立既得益于产业政策的引导，也顺应了工业化加速推进的经济现实。前期接近“计划经济”的政策已为重化工业的发展奠定了一定基础，再加上为配合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官方也新推出一系列产业升级政策；此外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催生对于基础设施的需求，继而带动重工业产业的扩张。以上因素的综合驱动下，日本重化工业迎来了迅速的发展，尤其是60-70年代的机械工业，增长尤为明显，逐渐接替钢铁、石化成为支柱。

对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五年累计）的拉动



资料来源：RIETI，太平洋证券研究院



资料来源：RIETI，太平洋证券研究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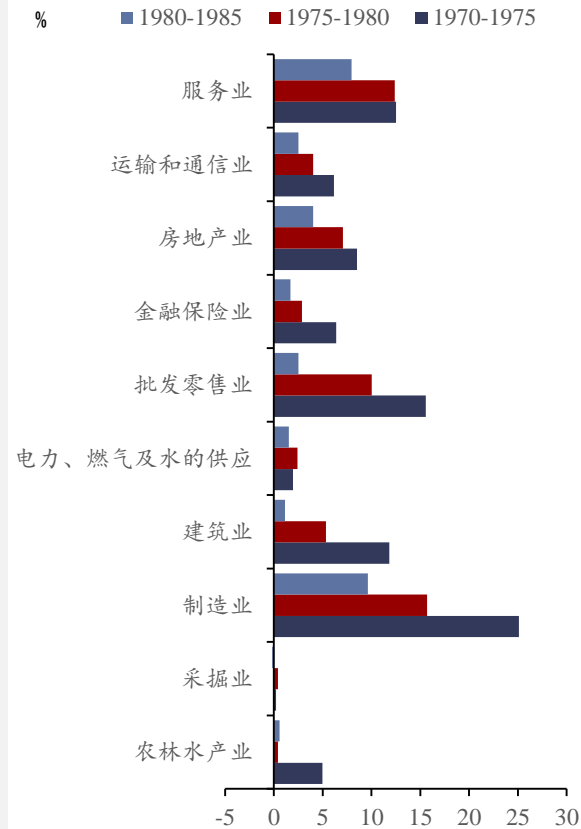
01

产业结构的升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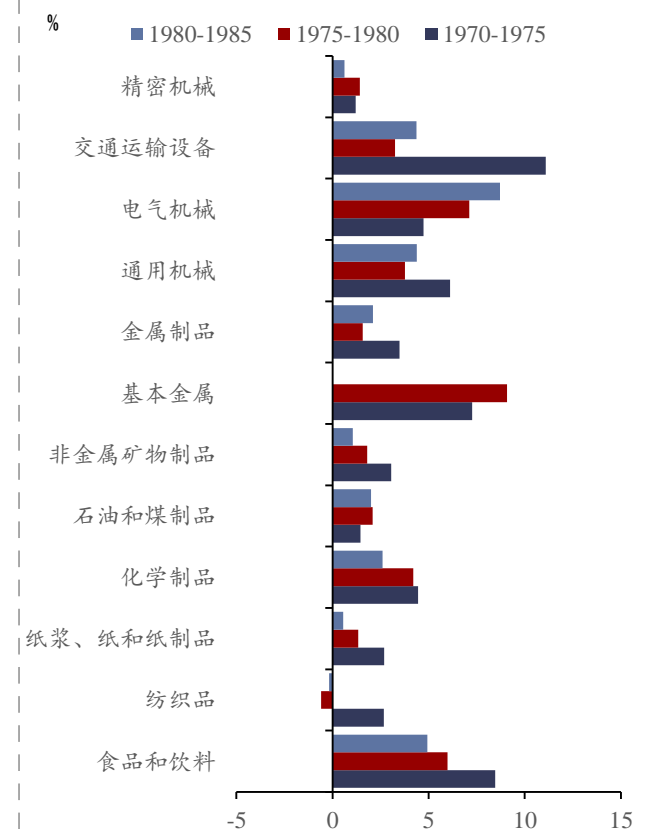
日本产业结构几多变迁

- 20世纪70年代 - 80年代中期，石油危机促调整，组装加工型工业成关键，服务业崛起。
- 石油危机的爆发引发日本产业结构的明显调整，低耗能的组装加工型工业以及第三产业成为大力发展的对象。1985年日本第一产业占名义GDP的比重持续下降，不足5%，第二产业占比降为35%左右，而第三产业占比上升超过60%。整体出口结构中钢铁、化学品等重化工业商品占比下降，技术及知识密集型的机械产品出口份额则明显抬升。
- 该阶段产业的转型基于较为复杂的现实背景，既有内部因素的影响，也有外部因素的驱动；既是短期冲击下的被动调整，也是中长期结构升级需求下的主动选择。地缘冲突、石油危机、贸易摩擦、日元升值、通胀压力以及落后产能过剩、环境污染等问题均影响了日本经济的发展，此前高速增长的土地不再，旧有产业结构亟需革新。该阶段日本产业发展重点聚焦于能源依赖度更低、技术密集型、设备轻量化、投资回收周期相对更短的组装加工业，比如汽车、家电、半导体等，同时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对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五年累计）的拉动



资料来源：RIETI，太平洋证券研究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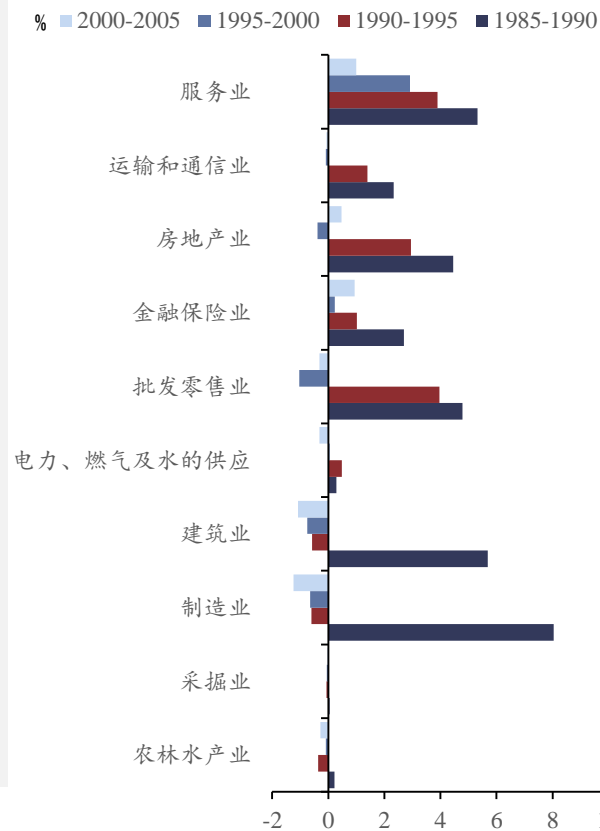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RIETI，太平洋证券研究院

01 产业结构的升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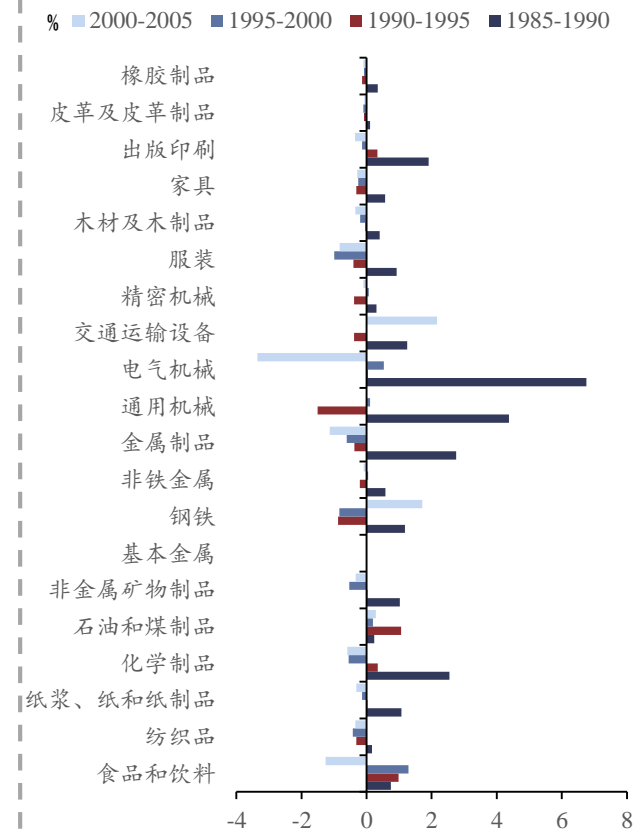
日本产业结构几多变迁

- 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高附加值产业为支柱，第三产业占比居前。
- 80年代中后期《广场协议》签订、日元升值及美日贸易摩擦升级等导致出口型制造业企业向海外开启新一轮的转移。同时在“科技立国”、“知识产权立国”战略的指引下，日本产业结构向现代化迈进。
- 表现在产业占比上，一方面创造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势头旺盛，占比抬升，比如计算机、微电子、生物工程和新材料等高附加值的新兴产业成为经济的重要支撑，另一方面传统的资本密集型、劳动密集型产业比重下降，同时服务业、金融业和信息产业等第三产业在产业结构中的占比稳步扩大。第一产业占GDP比重不断下降（21世纪初在1%左右低位趋稳），第三产业所占份额整体上则呈扩张态势，对于就业人员的吸纳效应也有走强，20世纪90年代就业份额上涨至60%左右。从出口结构上来看，高技术产品的优势也相对明显，其出口额的增长幅度高出整体。

对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五年累计）的拉动



资料来源：RIETI，太平洋证券研究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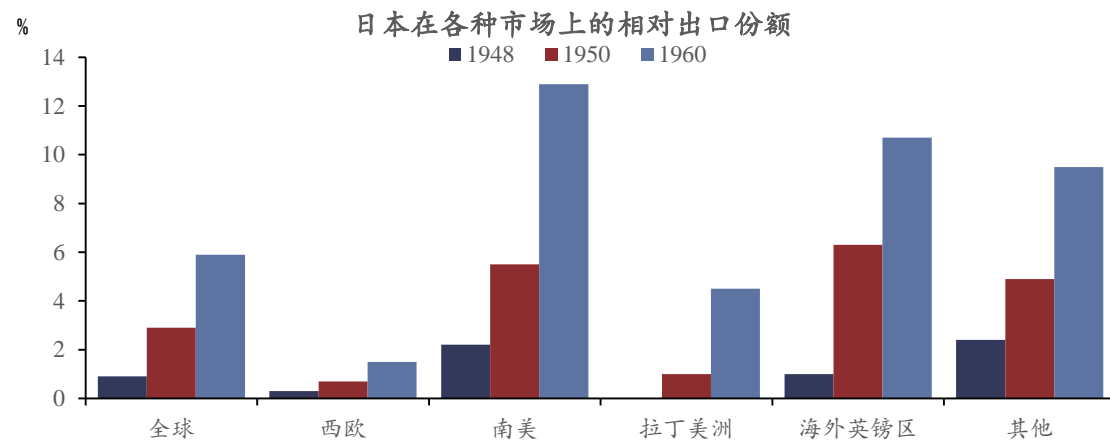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RIETI，太平洋证券研究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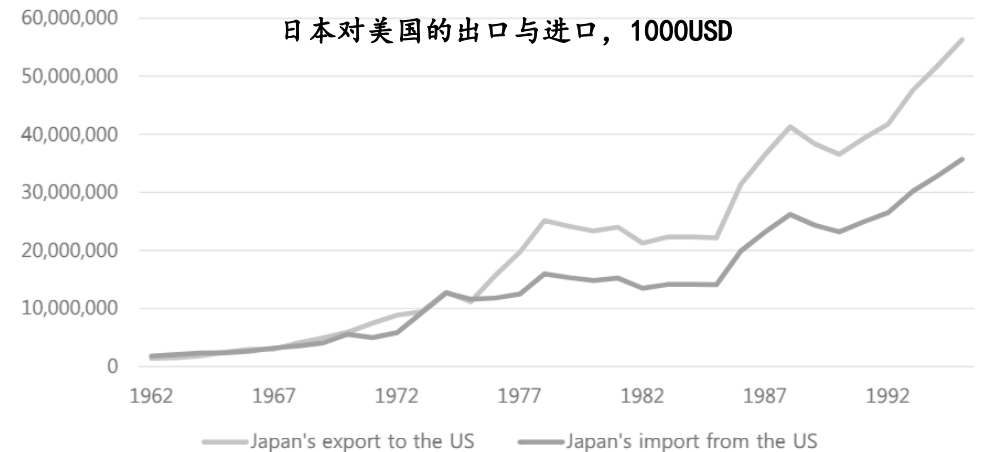
01 产业结构的升级

从美日贸易冲突的视角理解日本产业结构的升级

- 除了日本国内的经济、政策之外，美日贸易摩擦同样可以作为日本产业结构转型的观察视角。原因在于两者之间的相关性较强，美日贸易冲突围绕的行业沿日本产业结构升级方向而转变。
- 战后日本经济很长时间都呈现出“外需主导型”的特征，对外出口（尤其是对美国的出口）是其经济奇迹的重要驱动。但日美之间的贸易失衡对于美国的产业发展以及就业都构成了一定挑战，因此自20世纪50年代起美日贸易摩擦不断升级，历经多次发酵，直至90年代中期才有所降温。每次贸易冲突的模式也都类似，先是部分特定产品对美出口快速增长引发美国制造企业有关倾销以及不公平的投诉，后由两国政府进行谈判，最后就价格或数量推出解决方案。鉴于日本出口的优势产品与支柱产业高度重合，美日贸易冲突焦点的演变与日本产业的转型，两者方向往往呈一致性。通过梳理二战后美日贸易摩擦的发展历程，也可侧面了解日本国内的产业结构变迁。



资料来源：WTO，太平洋证券研究院



资料来源：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Peace: a Case Comparison Between the US-China and US-Japan Trade Disputes, 太平洋证券研究院

01 产业结构的升级

从美日贸易冲突的视角理解日本产业结构的升级

► 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美日摩擦整体范围不断扩张，冲突焦点也有所升级。与前文日本产业结构的调整相似，摩擦行业的调整同样遵循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及服务的方向，陆续就纺织品、钢铁、彩电、汽车、半导体、电信及建筑、金融等服务业爆发多次贸易冲突。

年份	月份	事件	日本首相	美国总统
1969	11月	尼克松-佐藤会晤：讨论了 纺织品 和冲绳的领土归还问题		1月 尼克松
1970	10月	尼克松-佐藤会晤：美日 纺织品 谈判开始		
1971	8月	尼克松宣布终止美元兑换黄金，征收10%的进口附加税		
1972	1月	钢铁 自愿出口限制（至1974年12月）	7月 田中角荣	
	10月	纺织品 协议		
1974			12月 三木武夫	8月 福特
1976	6月	特种钢 《有秩序销售协定》	12月 福田赳夫	
1977	5月	彩色电视机 《有秩序销售协定》（至1980年6月）		1月 卡特
1978		牛肉和橙子，第一份协议：进口配额增加	12月 大平正芳	
1979		关贸总协定东京回合结束		
1980		日本电报电话公司的采购	7月 铃木善幸	
1981	5月	汽车 自愿出口限制（持续至1984年3月）		1月 里根
1982			11月 中曾根康弘	
1983-1984		牛肉和橙子，第二份协议，扩大配额		
1984		1981-1983年， 汽车 自愿出口限制扩大至168万辆；1984年更新以后扩大至185万辆；1985-1991年扩大至230万辆；1992-1993年165万辆。		
1985		牛肉和橙子关税削减谈判		
1985		中曾根康弘和里根同意就市场导向的特定部门协议（MOSS）举行谈判；允许以下产品进入日本市场：林业产品、电信设备和服务、电子器件、药品和医疗设备		
		美国 半导体 协会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款就市场准入问题起诉日本		
		半导体协议谈判启动		
		9月《广场协议》：非美元货币升值		
1986		达成市场导向的特定部门协议		
		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开始		
		9月美日 半导体 协议（量化目标：外国产品在日本的市场份额达到20%，不倾销）		

1987		机床 自愿出口限制（持续到1993年10月）	11月	竹下登	
		美国声称发现了日本倾销的证据，对日本出口的 半导体 实施报复性关税			
1988		牛肉和橙子，第三份协议。取消配额和保护性关税。关税税率将逐步降低。《公共汽车贸易法案》，颁布“特别301条款”			
1989	5月	根据“特别301条款”认定不公平贸易行为（日本、印度和巴西）	6月	宇野宗佑	1月 老布什
	7月	老布什和宇野宗佑同意公布一项结构性障碍倡议，会谈持续到1990年5月			
		日方的问题：储蓄-投资模式，土地使用，分销系统，经连会，排他性的贸易行为	8月	海部俊树	
		美国的问题：储蓄-投资模式，企业投资和生产率、政府管制、促进出口			
1990	5月	有关结构性障碍倡议的最终报告提交给老布什和海部俊树			
1991		牛肉关税开始实施：1991财年关税为70%，1992财年为60%，1993财年为50%	11月	宫泽喜一	
	6月	第二份 半导体 协议（持续到1996年7月）			
1992		机床 最终协议			
1993	4月	宫泽喜一和克林顿同意开启美日新经济伙伴关系框架对话（框架对话）			1月 克林顿
	7月	美日框架对话开始			
	11月	细川护熙和克林顿在APEC西雅图会议期间会晤	8月	细川护熙	
1994	4月	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结束	4月	羽田孜	
	8-12月	达成关于知识产权、政府采购、保险和平板玻璃的协议	6月	村山富市	
1995	1月	世界贸易组织成立			
		就 金融服务 领域达成协议			
	5月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计划采取单边行动，对日本出口的豪华 汽车 征收100%的从价关税			
	6月	就 汽车整车和汽车零部件 部门达成协议（有效期至2000年6月）			
1996	8月	第二份半导体协议到期	1月	桥本龙太郎	
	12月	有关 保险 的新争端得以解决			

资料来源：《繁荣与停滞》，太平洋证券研究院整理

02 产业政策的演变

➤ 作为产业政策概念的起源地，日本较早便干预了产业的资源配置。广义角度理解，日本的产业政策可视为政府采取的关于产业的一揽子政策的组合，既涉及不同产业之间的要素协调，也包括产业内部各企业的合作与竞争引导。日本的产业政策是整体经济政策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政策目标服务于总体的经济目标，因此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需要及海内外形势下，产业政策的重点、支撑理论及手段也有所区别。梳理二战后日本的产业政策，可将其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总体上由政府主导、大力干预向放松管制、开放自由逐步转化。

阶段	概述	重点措施	特点
1940-60年代	培育特定出口产业	通过目标政策促进特定产业(纤维等)的资本积累，将剩余劳动力转移到新的产业，实现产业高度化 在国内培育具有规模经济性的重化学工业等产业 保护幼稚产业 废弃过剩设备(合理化卡特尔)	保护和培育特定产业；纠正市场失灵；供给侧政策；政府主导；防止过度竞争；应用、实用化导向；制造业振兴；财政刺激中等规模、中期
1970-1984年	稳定增长与国际摩擦	稳定增长中的新产业政策，向知识集约型产业结构转换 能源安全保障，节能以及石油替代能源政策 对公害问题的处理 国土的均衡发展 应对贸易摩擦、为国际作出贡献	
1985-2008年	结构改革	前川报告、日美结构协议 以放宽限制、自由化、民营化(航空、铁路、通信、邮政等)、整顿竞争环境、“小政府”等强化市场功能为目标的结构改革 “失去的20年”中，对产业政策的关心在全世界范围内下降	整顿市场环境；重视市场功能，担心“政府失败”；供给侧政策，民主指导促进竞争；基础研究导向(但规模有限)；重视基于短期、严格的费用效果分析的事前评价；制造业地位相对低下；财政刺激小规模、单一、短期
2009-2012年	紧急避难的措施	世界经济危机(2008年秋)，东日本大地震(2011年3月)，为避免企业因外生性需求冲击面临经营危机采取的紧急措施 扩大内需政策 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政策	
2013-2020年	安倍经济学	安倍“三支箭”：旨在摆脱通货紧缩、扩大财富的经济政策 企业业绩改善能扩大雇用和提高收入，进而增加消费，实现“经济良性循环”	
2021~	产业政策的新契机	微观经济政策和宏观经济政策的一体化(需求和供给两端) 设定积极的目标，产官学合作，规章制度，国际标准化，引导民间资金，国际合作等政策工具总动员，营造创新社会环境 设计和生产过程的数字化转换 重视包括服务业在内的供应链/价值链	解决多样化的中长期社会经济问题(“使命导向”)；担心“政府不作为”；创造具有野心和戏剧性的创新；重视综合性、多方面的事后评价；财政刺激大规模、长期、计划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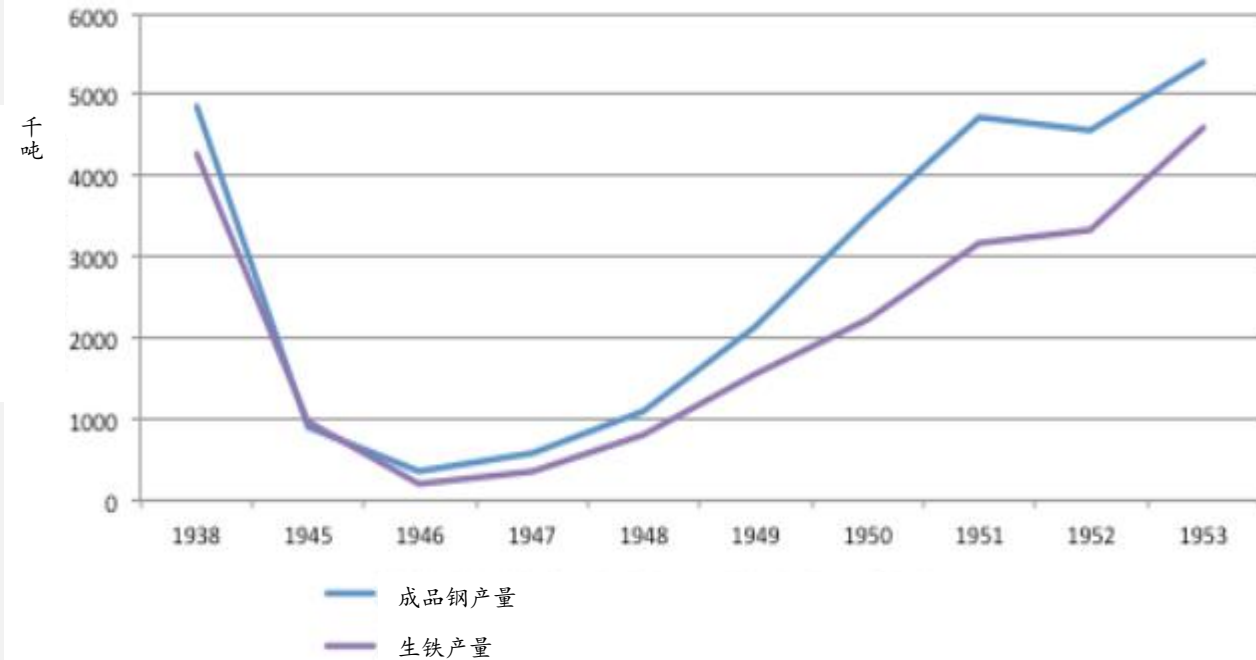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日本经济产业省，太平洋证券研究院整理

02 产业政策的演变

重建及追赶期1945-1960，政府主导产业保护和扶植

- 1945-1950，倾斜式生产方式，政府直接计划调控。
- 战后短缺经济供需矛盾突出。二战结束后日本经济及工业生产严重受损，而通胀却加速上升。人均GDP骤降，1946年生产指数仅为战前峰值的五分之一，近25%的国家财富在战争期间损失。通胀则飙升至100%-200%的水平，此外国际贸易也受到联军的严格限制，外汇储备及物质资源缺乏。
- 集中资源向基础产业倾斜。政府面临重建经济的艰难任务，其中煤炭与钢铁这两类基础材料行业被视作关键，政府试图恢复并扩大两者的产能继而带动其他部门的增长。为此，官方确定了“优先生产政策”，集中将原材料、劳动力和财政资源分配给钢铁和煤炭工业。这一时期的产业政策具有明显的“计划性”特点，政府直接调控私营部门的生产活动。具体而言，官方设立了复兴金融金库(Reconversion Finance Bank)（筹集资金的一个重要方式是直接向日本银行出售债券），向对恢复煤炭和钢铁生产至关重要的企业提供贷款；同时实施价格补助金制度，当消费者价格低于原生产者价格时，其差额部分由政府负担。
- 资源的倾斜促进了重点扶植产业的复苏。1949年日本煤炭行业与战前相比恢复超八成，钢铁则超出了战前水平。不过政府主导式的产业保护也产生了一系列的负面效应，一方面政府的资金支持进一步加大通胀压力，另一方面国家统制型的政企关系中私营企业也缺乏提高效率的动力。

日本成品钢与生铁产量，1938-19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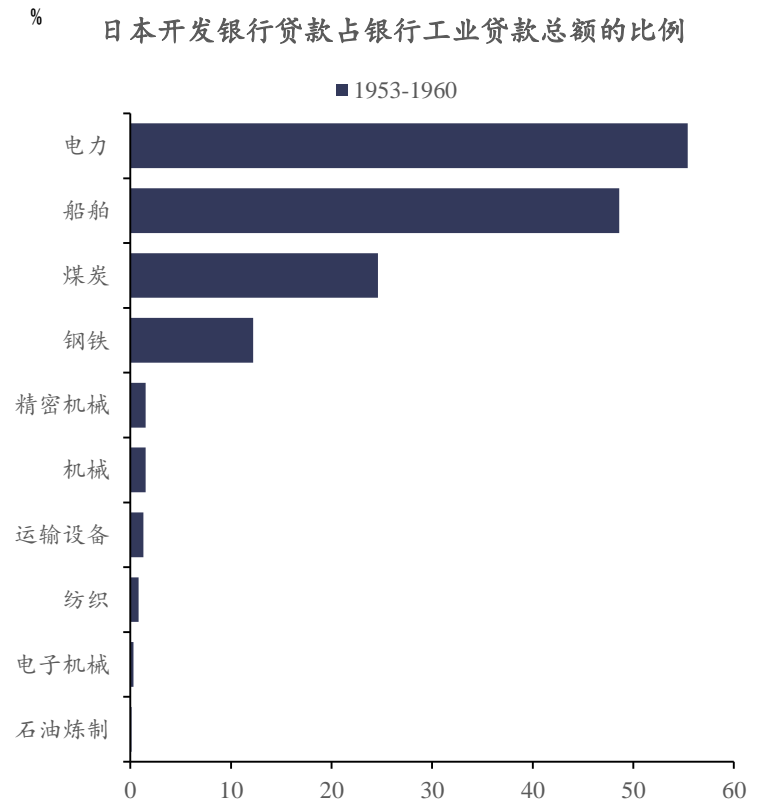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Downstream Beneficiation Case Study: Japan，太平洋证券研究院

02 产业政策的演变

重建及追赶期1945-1960，政府主导产业保护和扶植

- 1951-1960，经济发展转型，直接与间接干预并存。
 - 经济转换发展方向，产业政策重心随之调整。“道奇计划”的出台推动日本转向市场化经济。为对抗恶性通胀，道奇指示日本政府严格控制预算，因此很多政府管制、新发贷款以及补贴被取消，也为日本经济转向市场化、国际化提供契机。在整体经济发展方向调整的背景下，产业政策的重心不再聚焦于战后国内产能的恢复，而是向追赶国际水平、获得国际竞争力靠近，扶植的重点由上一阶段的“瓶颈”产业转向“支柱”产业以及“出口先导”产业。1950年初期官方确定的具有战略意义的行业除钢铁、煤炭外，还包括造船、电力、合成纤维和化肥等；50年代末又进一步发展石油化工、机床及零部件、电子等新兴产业。
 - 引入间接控制手段，“定向”扶持重点产业。不同于战后恢复阶段单一的直接调控，“追赶”期政府使用的干预手段更为多元，还设计了一些间接的调控方式。一方面对基础产业推出了装备升级相关政策，另一方面对暂时还不具备国际竞争力但具有高增长潜力或规模报酬递增的“成长型行业”提供保护扶植。具体政策手段包括重要机械特别折旧、重点产业技术设备进口税收减免、研发补贴、财政投资贷款、海运利息补贴、外汇配额等。
 - 以具体产业为例，针对钢铁行业设备落后的问题，日本通产省通过日本开发银行贷款和分配外汇进口轧机来支持设备更新；面对欧美汽车在日本市场的绝对比重，通产省先以海外技术投资推动合办企业设立，后严格限制海外汽车的进口，最终确定汽车国产化的体制。



资料来源：USITC，太平洋证券研究院


02 产业政策的演变

经济腾飞期1961-1972，放松进口限制适应自由化，鼓励企业合并减少过度竞争

- 经济高速增长，外汇及贸易自由化逐步推进。上世纪60至70年代是日本经济的快速增长期，平均增长率超12%。整体工业结构也呈现出明显的转型特点，由农业、轻工业急剧转向制造业、重工业。在这一鼎盛发展阶段，外界对于日本实施外汇、贸易自由化的呼声越来越高，日本也认识到放松管制融入国际经济体系难以避免，于是分别在1960年6月、1967年制定了“贸易外汇自由化大纲”、开启“资本自由化”。

贸易自由化

日期	1960-01	1960-10	1961-04	1961-06	1961-07	1961-10	1961-12	1962-04	1962-10	1962-11	1963-04	1964-01	1964-04
实现自由化的进口比例	42%	44%	62%	63%	65%	68%	70%	73%	88%	88%	89%	92%	93%



资料来源：IMF，太平洋证券研究院整理

资本自由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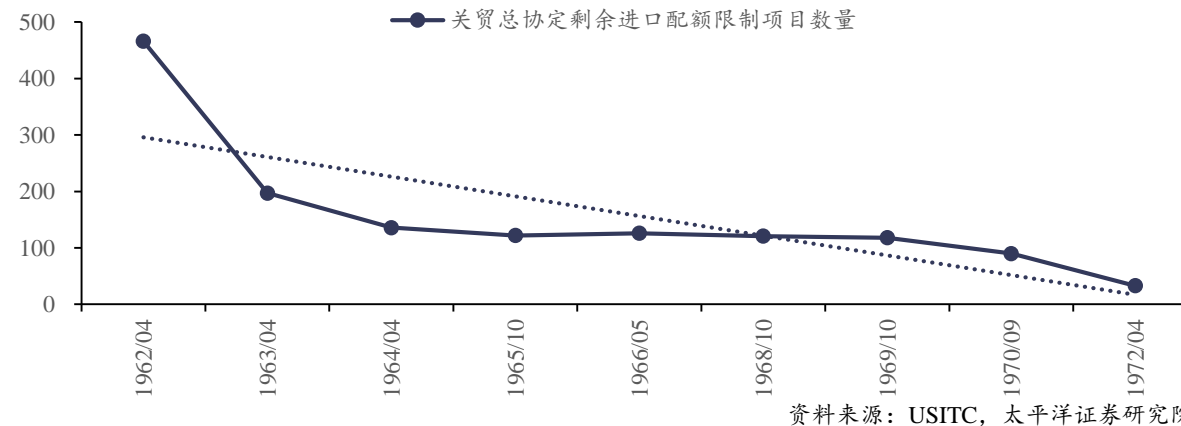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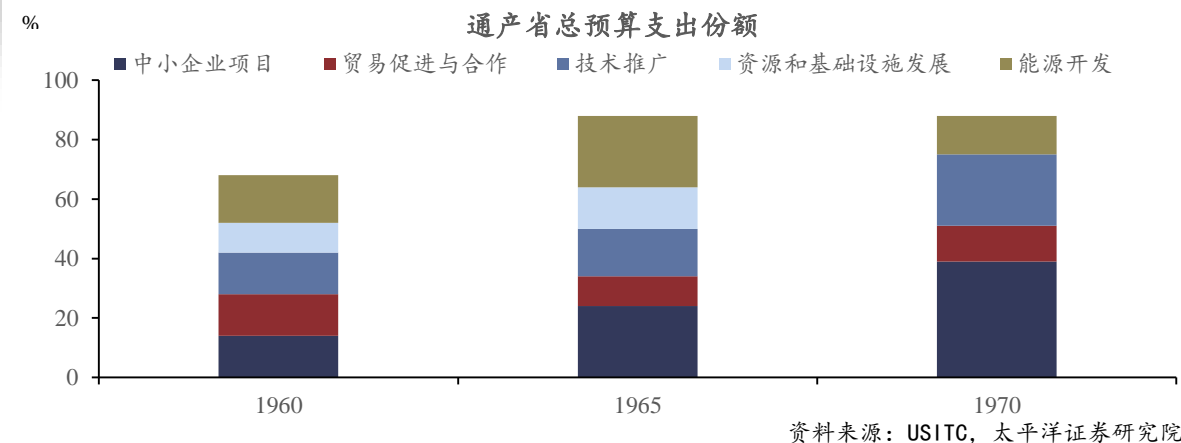
日期	操作
1967-07	引进子公司设立自动审批系统。批准在17个行业设立外商独资子公司。
1969-03	批准在44个行业设立外商独资子公司(新增27个行业)。
1970-09	批准在77个行业设立外商独资子公司(新增33个行业)。
1971-04	允许在汽车行业设立外资持股比例不超过50%的子公司。
1971-08	除7个行业外，允许所有行业设立外国子公司(根据行业的不同，持股比例从50%到100%不等)。这7个行业分别是：电子计算机或数据处理的制造、销售或租赁；拥有超过11家商店的零售业务；房地产；农林渔业；石油；皮革和皮革制品。

资料来源：USITC，太平洋证券研究院整理

02 产业政策的演变

经济腾飞期1961-1972，放松进口限制适应自由化，鼓励企业合并减少过度竞争

- 政策兼顾开放与战略产业扶持。
 - 随着自由化逐步推进，日本产业政策重心也有所变化。1963年日本发表《关于产业结构的长期展望》，将发展重化工业、提高产业的竞争能力作为实施产业政策的重要目标。
 - 在自由化之前，外贸及外汇的严格管制是日本政府保护扶植重点产业的重要手段，许多幼稚产业、成长型产业相关进口产品均受到许可证及外汇配额的限制。自由化启动之后，对于汽车、彩电、计算机等行业的进口限制陆续取消，1960年至1964年采取自动审批制度的进口比例由42%增加至93%，发展至1967年则进一步上行至97%。为应对自由化之后的国际竞争，官方试图组织部分行业的合并。一方面是为了实现规模经济，另一方面试图减少过度竞争，避免总产能过大、国际竞争力受损。
 - 同时官方并未放弃对一些战略产业的扶持。对于有望实现高生产率增长、收入需求弹性较大、就业吸纳效应强的产业（比如汽车、计算机、石油化工等），政府试图通过税收优惠、补贴等专门措施予以支持。



02 产业政策的演变

经济腾飞期1961-1972，放松进口限制适应自由化，鼓励企业合并减少过度竞争

- 产业政策干预性降低，市场机制占主导。
- 该阶段政府通过直接监管来干预市场的模式明显弱化，私营部门在决策中的重要性抬升，政府则主要承担协调者的角色进行辅助。一方面产业资源分配的主要决定因素在于市场本身。私营部门的观点可通过产业结构委员会在政策中得到较为充分的体现。另一方面私营部门试图抵制政府干预，转而支持自由的市场机制。以汽车工业为例，1961年日本工信部曾计划将汽车生产商缩减至三家，分别大规模生产汽车、特种汽车和微型车，后遭私营企业强烈反对，最终并未成功落地。
- 在上述新趋势下，政府不得不转变直接干预的方式，更多只能出台“愿景”及“计划”来帮助私营企业之间进行协调，同时为实现理想发展方向提供援助或激励举措。因此相比前期而言，该阶段产业政策对于市场的扭曲性有所减弱。

02

产业政策的演变

稳定增长期1973-1991，宏观经济遇拐点，产业政策促调整

- 经济面临“内忧”与“外患”。
 - 20世纪70年代起，日本步入稳定增长阶段，GDP实际增速的中枢明显下移，这一时期日本海内外形势均遭受剧烈变革。
 - 外汇角度，固定汇率制度终结，日元面临快速升值压力；
 - 通胀方面，前期货币政策管理不善叠加石油危机带来的进口成本飙升，国内通胀快速上行；
 - 产业层面，主要矛盾由供给不足转向需求不足，经过前期的充分增长，部分高能耗的重工业趋于饱和，再加上原材料进口成本压力不断增加，相关企业陷入收益率下降、生产设备过剩的困境；
 - 国际贸易而言，一则日元升值削弱出口竞争力，同时来自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竞争加剧。二则，对美国的长期贸易顺差以及贸易保护限制措施引发美日贸易摩擦，且冲突不断升级。
 - 最后就社会问题来看，前期快速增长的工业化引发环境污染、人口分布不均衡等多种社会矛盾。

02

产业政策的演变

稳定增长期1973-1991，宏观经济遇拐点，产业政策促调整

➤ 政策转向多元目标，推动产业优化升级。

- 为处理上述各方矛盾，产业政策锚定的目标也有所转变，政策重心不再限于特定产业，而是强调全局性的协调；政策机制也进一步向市场导向型推进。对于外界有关贸易施加的压力，日本官方立场向支持自由贸易逐渐靠近，并不断降低关税，放松管制、开放市场；增加社会支出以应对工业化快速推进导致的社会问题。

财年	产业政策重点	优先事项
1973	改善国内福利，促进国际合作	建立无污染社会
1974	改善国内福利，促进国际合作	物价稳定，消费生活丰富
1975	进一步完善国内福利与国际合作	物价稳定，消费生活丰富，为舒适生活奠定基础
1976	改善国内福利，为国际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贡献	推动产业政策实现日本经济复苏稳定发展
1977	进一步丰富国内福利，积极促进世界经济的稳定发展	稳定增长条件下新兴产业政策
1978	开辟新繁荣的道路；以及日本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制定刺激措施和新产业政策
1979	实现丰富的家庭生活、向稳定增长平稳过渡，保障日本经济社会繁荣发展的动力	制定20世纪80年代的产业政策愿景
1980	-	确保能源安全
1981	致力于建设具有活力和经济安全的社会	建立能源安全并为摆脱石油依赖做好准备
1982	为日本的长期发展奠定基础	稳步发展综合能源政策
1983	积极为世界经济做出贡献，为日本经济增长奠定基础	从中长远的眼光促进产业振兴和技术发展
1984	促进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建立一个创造性的社会	形成创造性发展的基础
1985	为长期发展和国际贡献奠定基础	为技术发展奠定基础
1986	迈向国际化新高度，奠定长远发展基础	迈向国际化新高度
1987	致力于构建创新发展的新经济和产业社会	从国际视角推进产业结构政策
1988	致力于国际协调，为经济社会注入活力	给当地社区带来活力
1989	致力于全球和新的长期发展	致力于国际经济共同体
1990	实现“全球共存繁荣”和“充满休闲活力的经济社会”	纠正外部失衡，实现国际协调的经济结构和产业活动
1991	-	实现舒适和丰富的生活方式

资料来源：RIETI，太平洋证券研究院整理

02

产业政策的演变

稳定增长期1973-1991，宏观经济遇拐点，产业政策促调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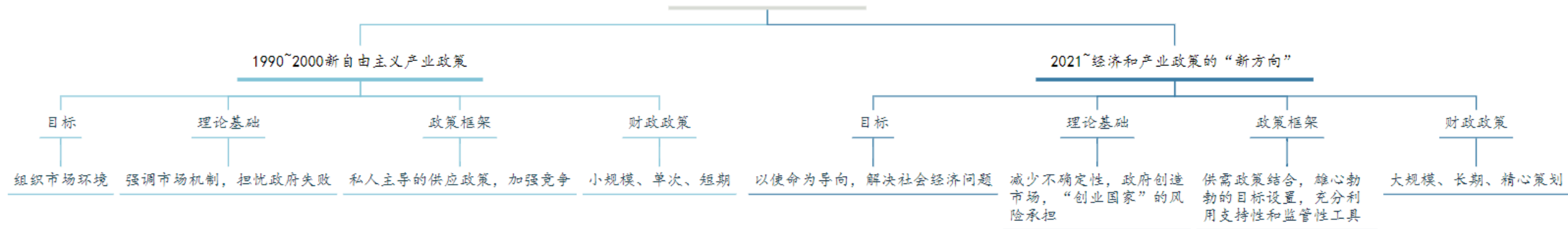
- 更为重要的是，该阶段产业政策的战略方针出现革新。政策力促产业的升级与高度化，推动向“知识密集型”高附加值产业的转型，由此带动经济转向内需主导型。
- 实际上有关知识密集型产业的构想早在1968年就有提出，后经多次讨论，1971年正式发表相关文件；80年代起，官方文件指出前期追赶欧美发达国家的使命已基本完成，日本战略方针正式由“贸易立国”转向“科技立国”。
- 为落实这一方针，日本沿以下两个思路进行了产业政策的设计：一是推动结构性萧条的产业处置过剩设备；二是鼓励私人部门研发活动，向新兴产业倾斜要素资源。衰退产业转型方面，1978年、1983年分别出台《特定萧条产业安定临时措施法》、《特定产业结构改善临时措施法》，指定存在结构性问题的衰退行业，要求指定行业制定设备处置计划，并通过政策性融资、税收减免和反垄断法豁免等方式促进这些产业的合理化或加速其调整进程。新兴产业扶持方面，官方直接提供政策支持、资金补贴以激励国内企业自主研发和外部技术吸收改进。
- 以集成电路为例，70年代之后政府陆续出台相关补助金制度以及法律，对于项目研究提供专项资助；另一方面，官方协调私营公司组成技术研究协会，开展联合研发工作。1976-1979年期间，日本富士通、日立、三菱电机、NEC及东芝五家计算机生产商组建成为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研究协会共同开发高密度高速半导体，期间通产省以及成员公司提供的资金占比半导体行业研发总支出的50%，最终产生1000多项的专利申请，实现了集成电路领域赶超式的发展。

02 产业政策的演变

长期停滞期1992年至今，强调经济结构改革，产官学联合推动技术创新

- 1992-2020，对政府失灵担忧下的新自由主义产业政策。
 - 经济增长需新动能助力。1991年后日本因资产泡沫的破灭陷入长期低迷，再加上赶超时代结束后，前期引进和消化国外技术的模式较难助推经济持续增长，日本需要构建新的增长基础，而原创性创新被视为一剂“良药”。1995年日本颁布《科学技术基本法》，在法律角度将“科学技术创造立国”作为基本国策；1996年6月开始实施科学技术基本计划，力图建立新研究开发体系，推进基础研究；2002年，日本颁布《知识产权基本法》并在2003年成立高规格知识产权战略总部，正式确立了“知识产权立国”的国策。

日本产业政策的调整



资料来源：日本经济产业省，太平洋证券研究院整理

02 产业政策的演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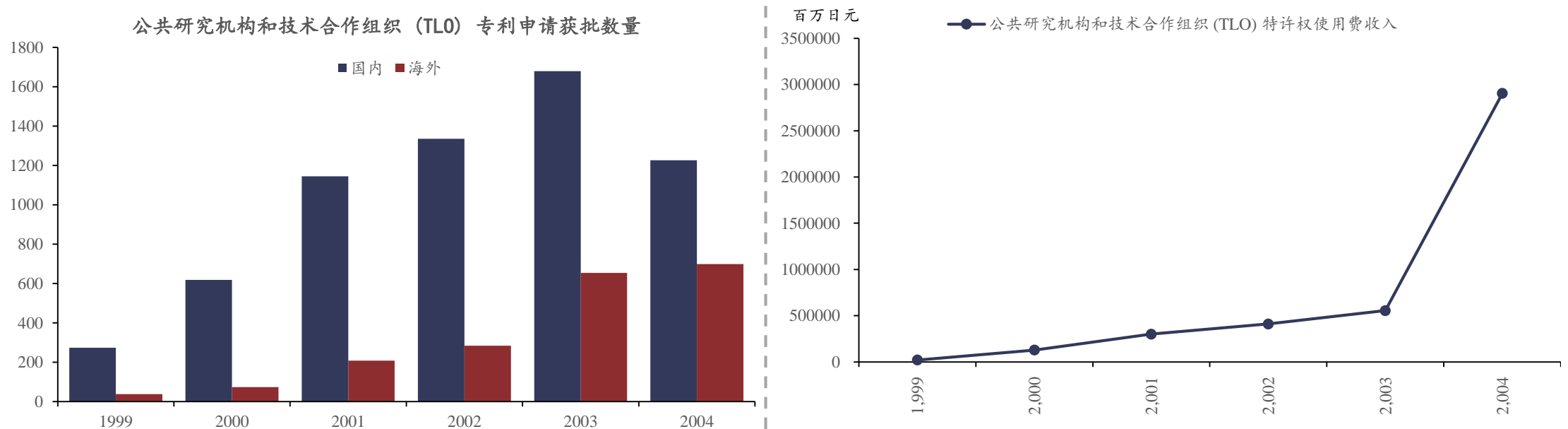
长期停滞期1992年至今，强调经济结构改革，产官学联合推动技术创新

- 1992-2020，对政府失灵担忧下的新自由主义产业政策。
- 为实现创新型经济增长，产业政策作出系列调整。面向对象由特定产业转为上游的基础研究，重点也落在了经济结构改革层面，通过放松规制、强化竞争推动经济向内需导向的结构转变。
- 一方面全面放松行政干预，强调市场机制作用。1993年通产省下属的日本经济产业省委员会曾推出“临时提案”，指明当时的日本存在一些有碍产业发展的中长期结构性矛盾，其中涉及政府监管、准入限制的有效性讨论，指出现有机制保护了部分低效且缺乏竞争力的行业，从而限制了产品的多样化。即有可能出现政府失灵的问题。对此提案强调需要进行监管、企业、就业及金融制度的改革，以此来改善市场功能、更好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以放松管制为例，1995年官方制定为期三年的《放松管制行动计划》，涉及11个领域与1091个项目。1996年、1997年相关项目数量又分别增加了569个、890个。官方积极推动并深化改革计划，以期实现充分利用市场力量的经济结构。
- 另一方面推动产官学联合体制发展，积极促进科研成果产业化。产官学合作旨在通过政府支持，联合高校以及企业展开合作创新，从而增强日本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具体来说，这一体制利用高校科研实力，以基础研究为技术开发创建理论基础，同时发挥企业的经济实力，将创新技术与产品推向市场继而为科学研究提供经费支持。该体制在20世纪中期以来便得到采用，而20世纪90年代起《科学技术基本法》、《大学技术转移促进法》及《独立行政法人科学技术振兴机构法》等法律法规的颁布则为上述体制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1995年后产官学联合广泛且迅速开展。一方面，政府和民间成立科技中介机构搭建科研成果和企业之间的联系，政府对其提供法律、资金和风险管理等支持；另一方面，企业与大学之间展开合作，企业委托大学进行研究，大学则设立专门部门与企业沟通联系并争取科研资金。

02 产业政策的演变

长期停滞期1992年至今，强调经济结构改革，产官学联合推动技术创新

- 从2004年数据来看，大学和民间企业联合研究突破1万件，同比增加16%，大学接受企业委托研究超过1.5万件，较前值增加11%。截至2005年3月底，公共研究机构和技术合作组织（TLO）取得的专利实施许可件数为1863件。这一合作机制通过创造并活用知识，保障日本在知识社会中的国际竞争能力，有效践行了“科学技术创造立国”的基本国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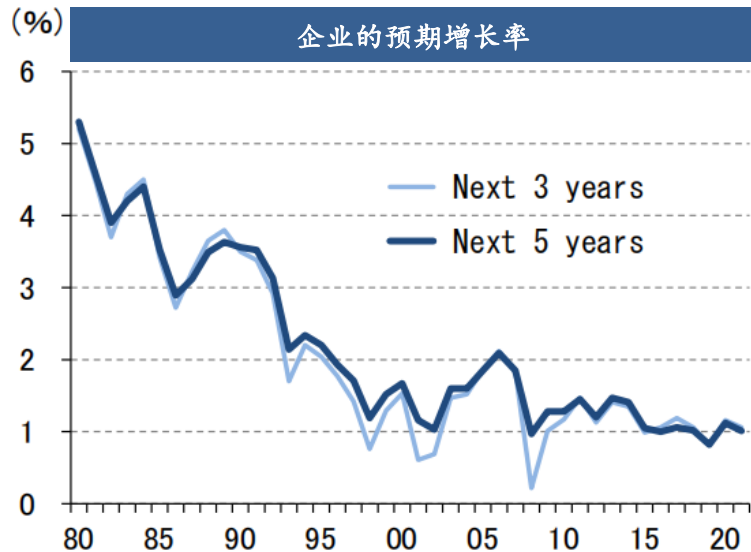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日本文部科学省，太平洋证券研究院

资料来源：日本文部科学省，太平洋证券研究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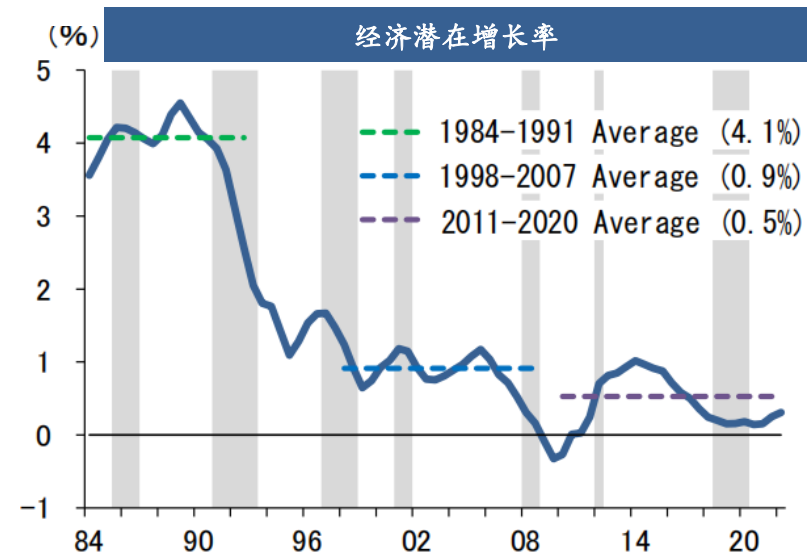
02 产业政策的演变

长期停滞期1992年至今，强调经济结构改革，产官学联合推动技术创新

- 2021至今，后新冠时代产业政策创新，公私合作重塑社会经济体系。
- 经济低增长的宏观环境遇变化。上世纪90年代日本资产泡沫的破灭引发后续近三十年的低速增长与通缩。在“失去的三十年”中，私人部门对于未来的悲观预期以及财富严重缩水的客观现实引发漫长的去杠杆进程，日本国内整体投资以及消费活力疲弱。一则企业聚焦于成本削减，对于新兴领域进行大规模投资的意愿低迷，同时工资增长受制；二则居民信心不足，加上实际工资同比长期处于低位，消费表现同样弱势。因此彼时日本经常账户平衡的支撑主要来自贸易上的顺差或者海外投资收益。此外政府对于新自由主义存在过度践行的可能，注重改善市场环境，但相比而言，创造新价值的努力则显得不足。



资料来源：日本经济产业省，太平洋证券研究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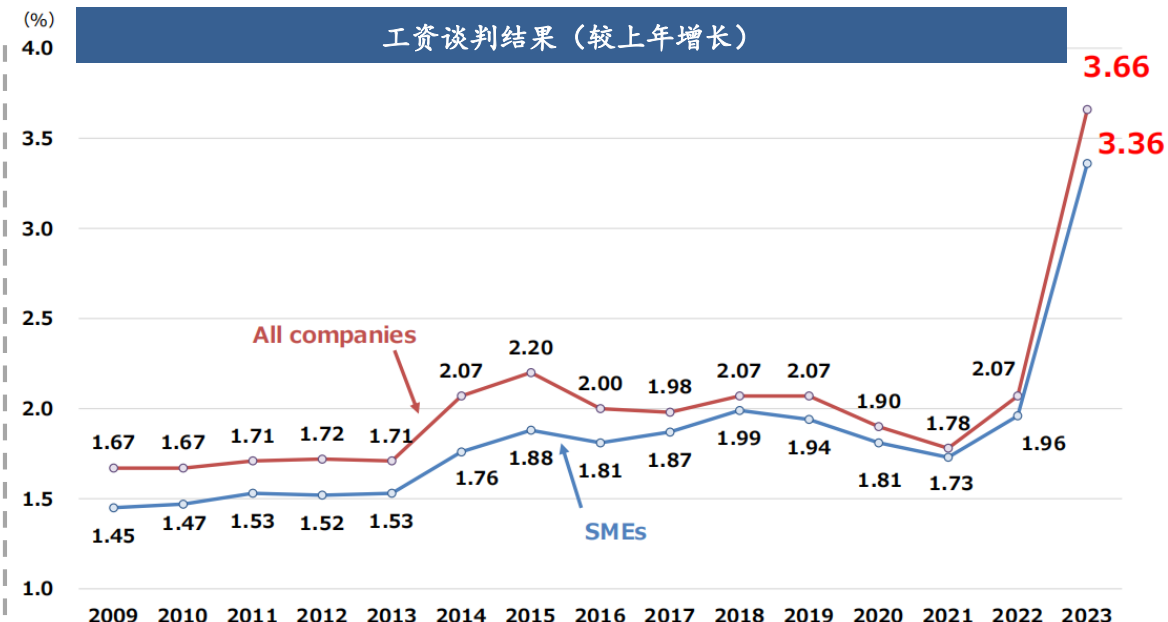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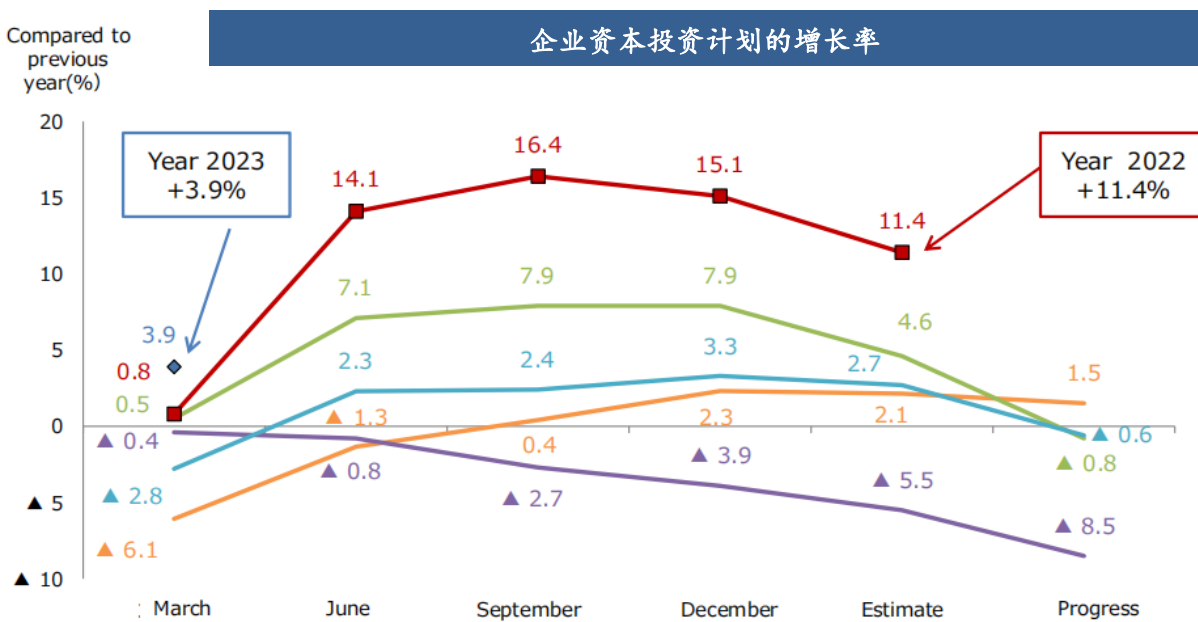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日本经济产业省，太平洋证券研究院

02 产业政策的演变

长期停滞期1992年至今，强调经济结构改革，产官学联合推动技术创新

- 2021年起宏观环境方面发生了诸多调整。一方面地缘政治、疫后经济修复、全球通胀及劳动力短缺等因素助推日本国内投资及工资的上涨，另一方面美国、欧盟等海外经济体陆续出台半导体、气候变化、能源安全相关产业政策。在上述变化的影响下，2021年日本经济产业省也在产业结构审议会内设立了经济产业政策新方向委员会，同时官方提出了“经济产业政策新方向”并推出能源安全、经济安全、创业发展五年计划、人力资本投资支持、中小企业成长等多项政策。



资料来源：日本经济产业省，太平洋证券研究院

资料来源：日本经济产业省，太平洋证券研究院

02 产业政策的演变

长期停滞期1992年至今，强调经济结构改革，产官学联合推动技术创新

- 供需两侧政策相结合以解决社会经济问题。新兴产业政策与此前的幼稚产业保护、放松管制等方向的产业政策存在差异。根据经济和产业政策局的官方阐述，经济产业政策的“新方向”在于“培养期望”以实现可持续和持续增长，具体包含十四大政策主题（其中“使命导向型”产业政策覆盖8个主题，更新社会经济体系覆盖5个主题）。通过刺激新需求、投资于供给方面的高附加值领域、推进结构转型，最终将实现“国内投资、创新、收入增长”的良性循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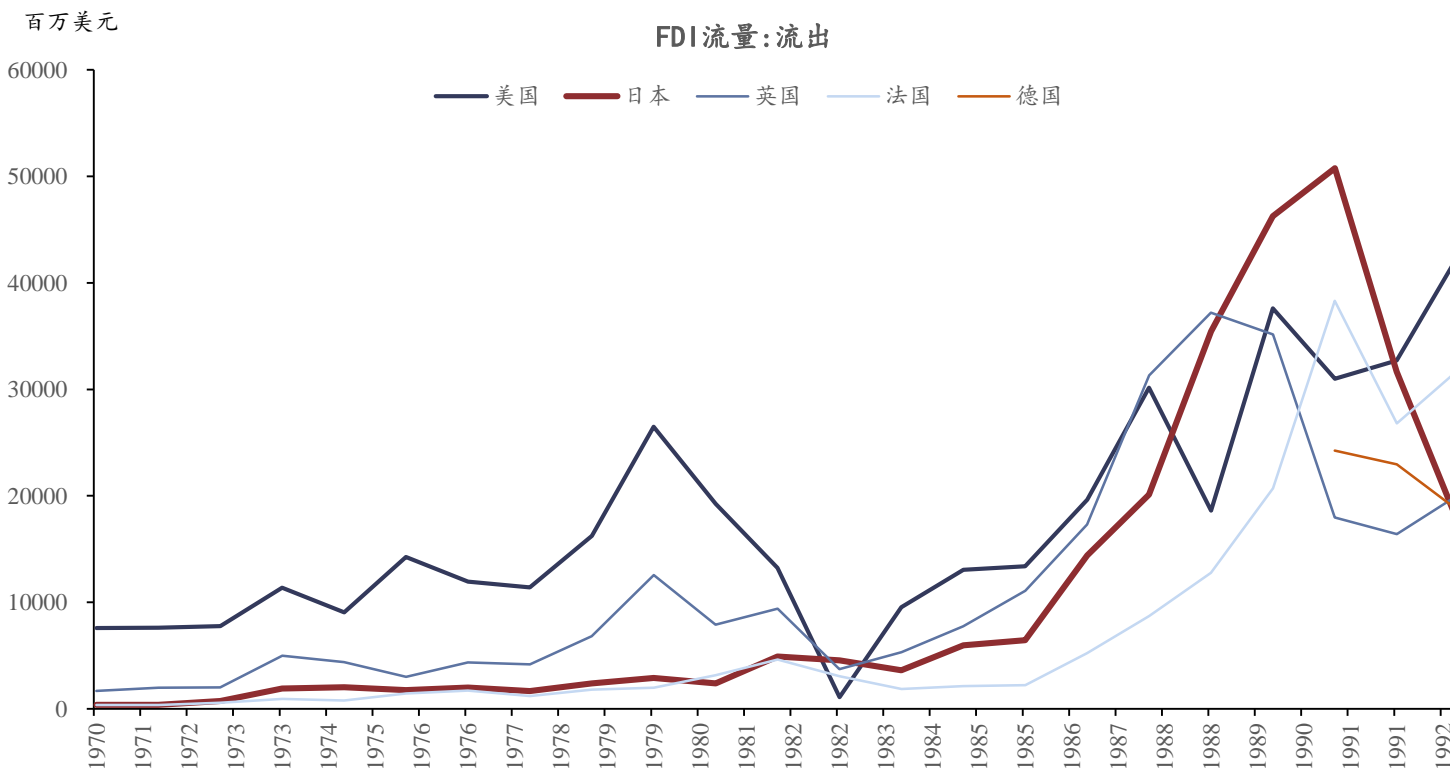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日本经济产业省，太平洋证券研究院整理

03 产业的对外转移

同样丰富的产业转移经验

- 除了产业政策值得借鉴，日本的产业转移同样十分活跃，也积累了很多经验。其海外转移的规模及水平居于世界前列，1985年之后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增幅明显，一度超过美国成为全球对外投资第一大国，20世纪80年代末对外直接投资跃升至全球排名首位。
- 就转移结构与方式而言，二战结束至21世纪，日本对外的多次转移先后涉及劳动密集型、高耗能及高技术附加值产业，区位选择上既涵盖发达国家，也锚定新兴市场。产业的转移对应着多层驱动逻辑，主要受比较优势变化、产业结构优化需要、市场开拓诉求、贸易摩擦及产业链风险规避等因素的影响。具体转移方式则包括对外直接投资、贸易、外包以及产业协作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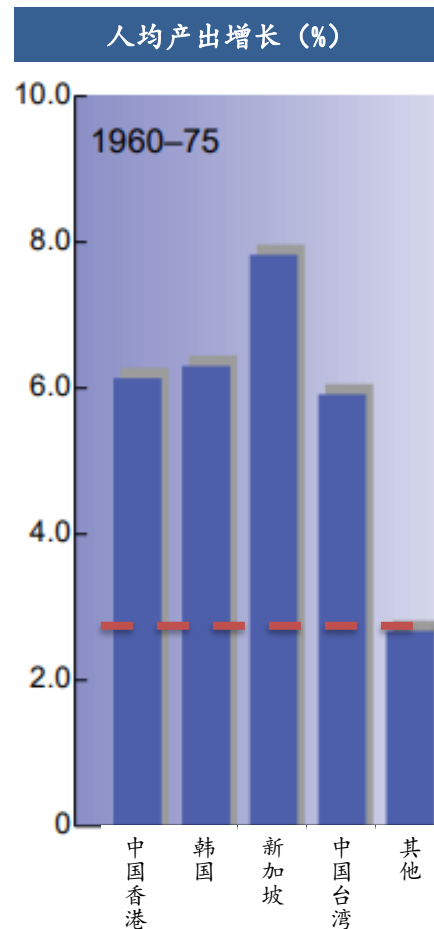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 iFinD, 太平洋证券研究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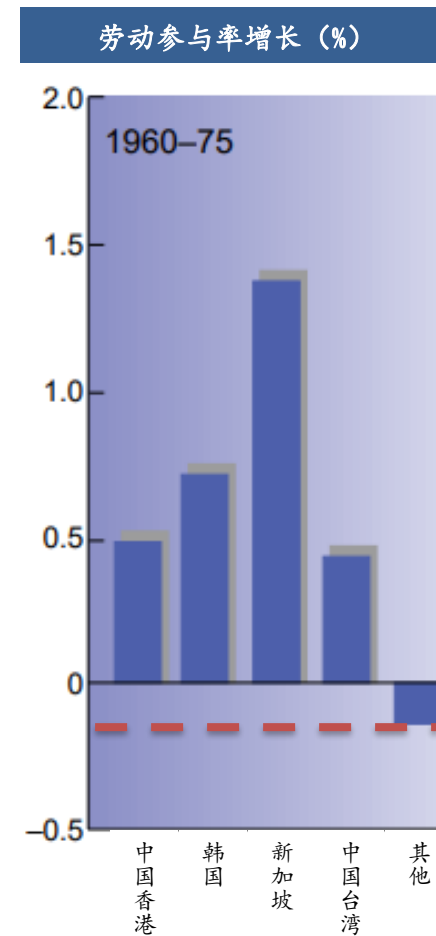
03 产业的对外转移

产业转移的演进

- 20世纪60-70年代发生第一次大规模对外转移，转出以纺织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转移区位集中于“亚洲四小龙”等新兴市场。此外日本还对于第三世界国家转移开采技术及资金，进行资源开发型投资。
- 这一阶段的产业外迁主要受日本要素禀赋以及比较优势变化的驱动，也是“雁行理论”在实践当中的明显体现。
- 理论上来说，各国分工的差异构建了国际产业转移的重要基础。不同经济主体的要素禀赋、创新能力、政策环境以及市场容量等方面存在区别，因此各自的竞争优势也有所不同。根据“雁行理论”，一国可以遵循自身比较优势的变化在国际间进行分工和产业转移，进而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资源的优化配置及经济效益的最大化。
- 日本这一阶段的产业转移可用上述理论解释。伴随经济步入腾飞时期，日本人力成本上升，此前劳动要素存在的优势逐渐淡化，再加上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已发展得较为成熟，出于降低经营成本、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考虑，日本需要寻找更具比较优势的市场来承接这部分边际产业，同时加强对外资源开发的投资以缓和国内资源匮乏的难题，扶持重工业的发展。而亚洲四小龙国家劳动资源相对充足并且价格相对低廉，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矿产资源丰富，是相对合适的区位选择。



资料来源：IMF，太平洋证券研究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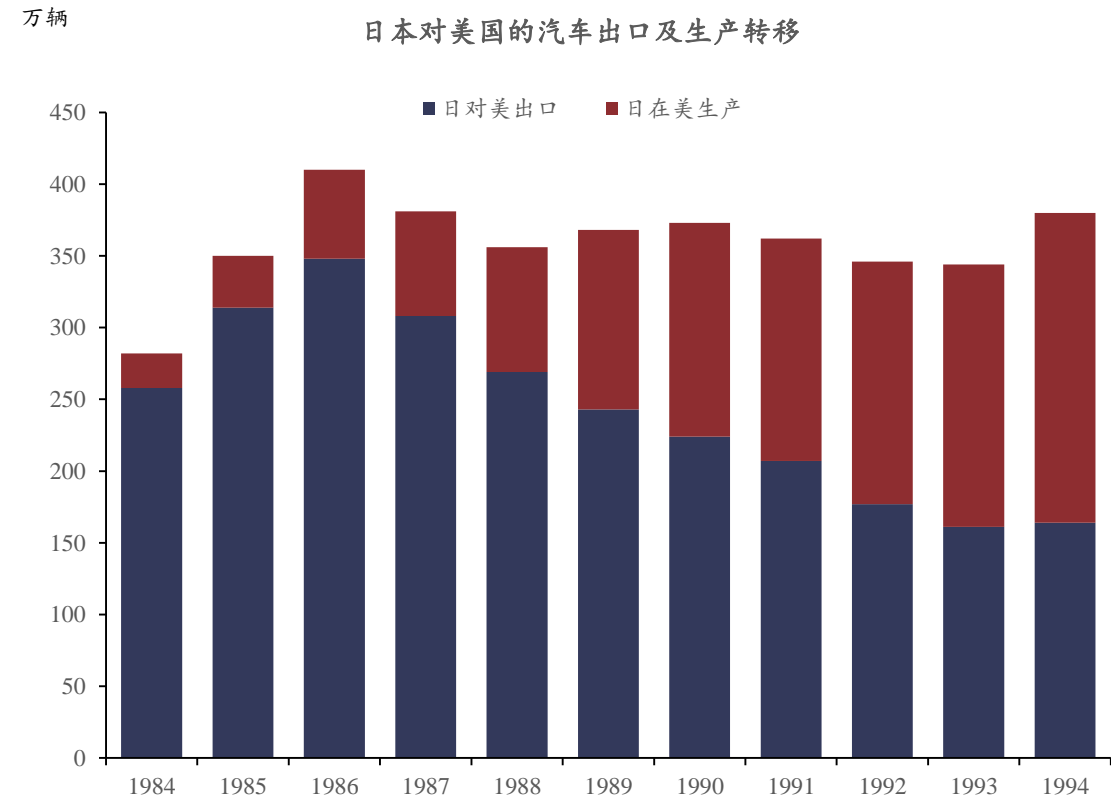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IMF，太平洋证券研究院

03 产业的对外转移

产业转移的演进

- 20世纪70-80年代日本产业的国际转移迎来第二波高潮，集中于资本密集型以及贸易摩擦相关产业。该阶段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明显增长，背景也相对复杂。一则两次石油危机促使日本收缩国内高能耗产业的规模，向周边发展中国家迁移；二则，为规避与美国之间的贸易摩擦、拓展市场、缓和汇率波动引发的出海阻碍，日本推动以汽车为代表的相关产业向北美、欧洲等发达经济体转移。
- 20世纪80年代-21世纪初日本对外迁移的产业范围扩大至高附加值的技术密集型产业，主要转移方向为欧美及东亚。该阶段产业的转移依旧存在贸易摩擦的驱动。随着日本国内汽车、机械、电器等行业的发展，其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承担的角色愈发重要，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贸易顺差也逐渐扩大，贸易冲突进一步升级。对此日本继续向发达经济体进行产业转移试图缓和矛盾。另一方面，1985年《广场协议》签订后日元大幅升值，1985年-1987年日元对美元升值超过50%。这使得日本因汇率贬值形成的出口竞争力渐失，叠加周边东亚国家的投资环境与承接能力对于日资的吸引力加大，日本也加快向海外转移部分高技术制造业的步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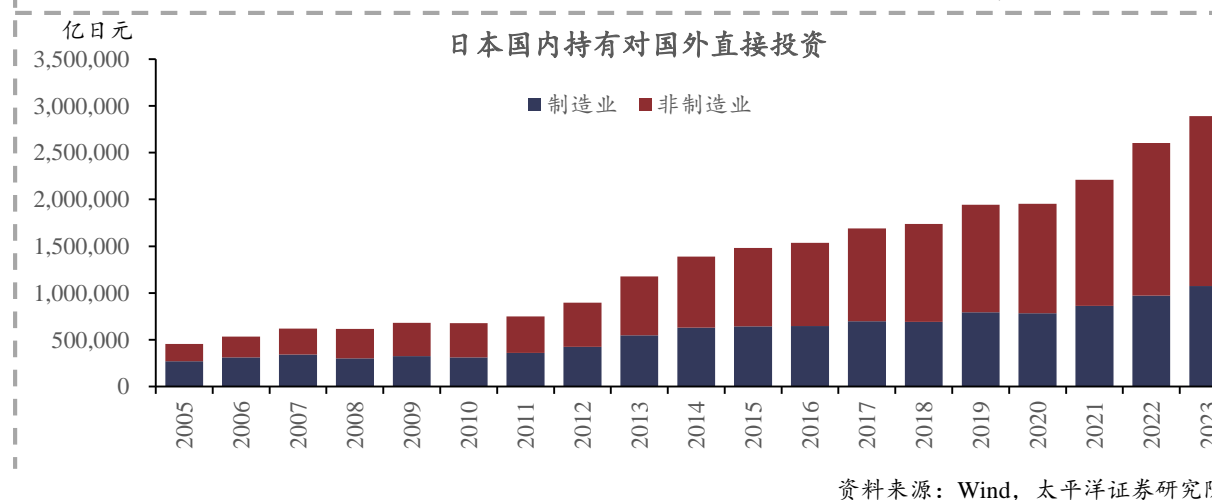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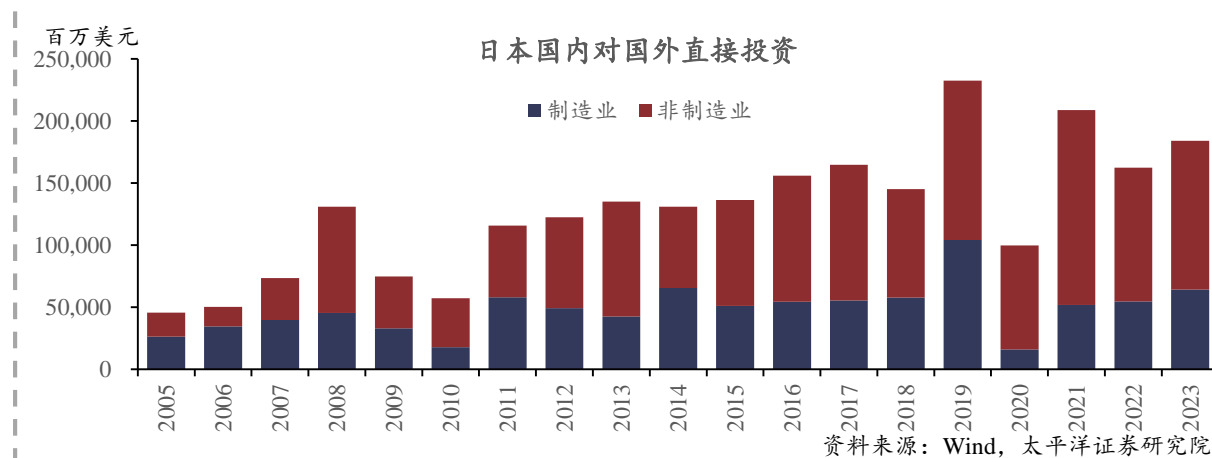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Trade conflicts between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over market access: The case of automobiles and automotive parts, 太平洋证券研究院

03 产业的对外转移

产业转移的演进

- 21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趋于深化叠加日本国内经济增长长期停滞，日本也展开新一轮的国际产业转移。
- 外部来看，新世纪以来生产要素在各国间流通更为顺畅，生产力以及国际分工步入高度发展阶段。随全球价值链的形成，各国产业间的关联性增强，构成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的重要基础。内部而言，日本国内现实背景也凸显了产业向外转移的必要。经济增速中枢下移，长期增长动能缺乏，企业向外投资、拓展海外市场以弥补国内需求不足及成本增加的限制。
- 1996年至2023年，日本国内持有对国外直接投资规模增长超8倍，2023年占当年GDP总量接近五成。
- 具体产业结构方面，非制造业发展为对外投资产业的“中流砥柱”。从此前的转移实践来看，日本企业对外投资中制造业往往占据主要地位，这与各阶段日本产业的优势相对应。这种趋势在21世纪初期仍在延续，即对外投资中制造业占比较大。但随着日本国内金融与保险业、批发零售业以及通讯业的等服务业的发展，非制造业在整体对外投资中所占的比重也渐进抬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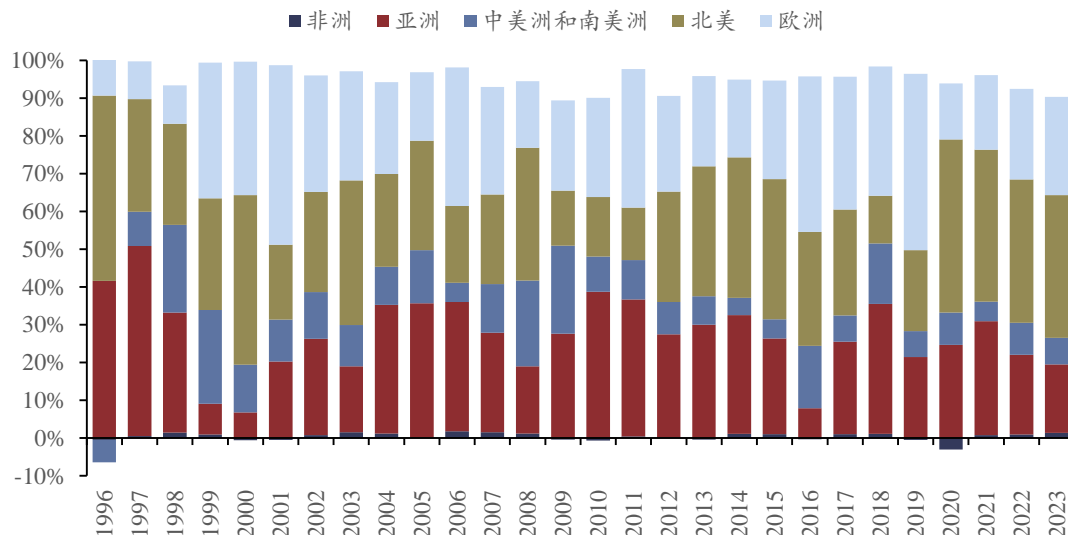


03 产业的对外转移

产业转移的演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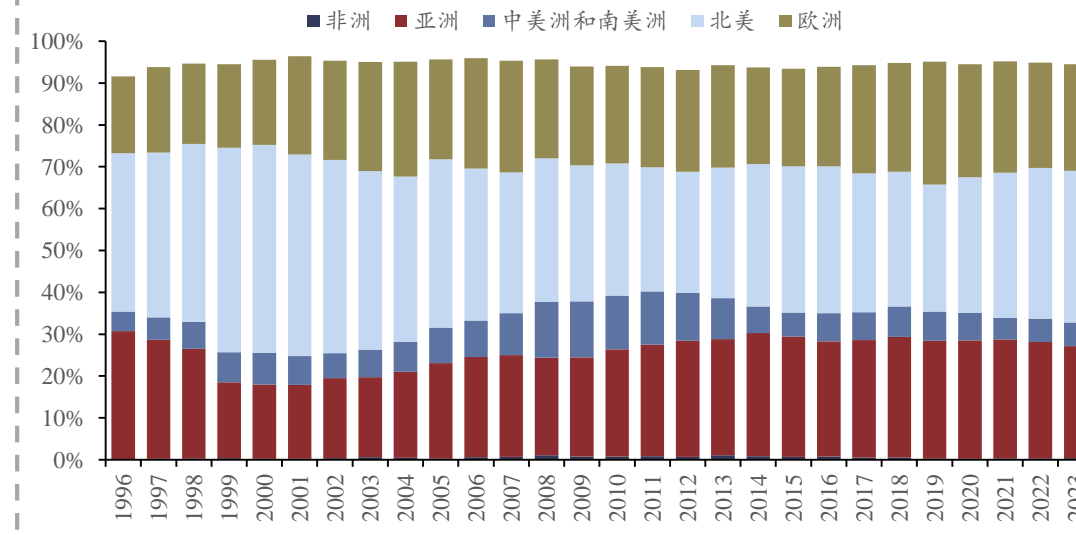
- 21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趋于深化叠加日本国内经济增长长期停滞，日本也展开新一轮的国际产业转移。
- 转移区域上，发展中的新兴经济体重要性逐渐提升（尤其是中国、东盟等亚洲地区）。从对外投资总量上来看，美国及欧洲占比居前，但边际来看日本对发展中区域的转移力度呈现出加大态势，这在中国、东盟等亚洲地区体现得更为明显。这既受日本降低生产经营成本的驱动，也得益于新兴市场投资环境的改善，同时发展中国家销售市场相对广阔、需求快速增长也推动日本积极向其转移产业从而享受发展红利。

日本国内对国外直接投资占比



资料来源：Wind，太平洋证券研究院

日本国内持有对国外直接投资占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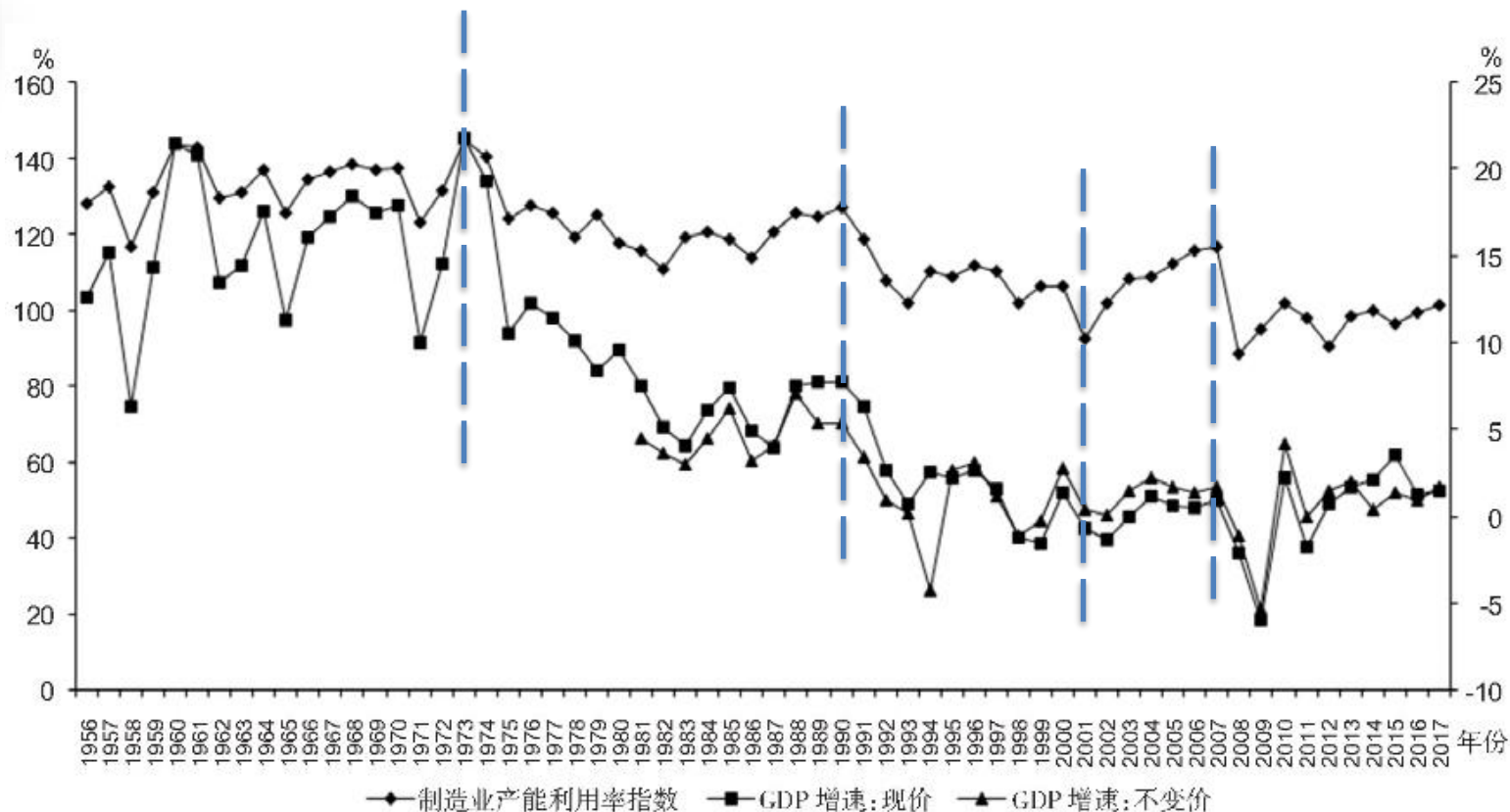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Wind，太平洋证券研究院

04 产业结构升级与转移中的困境

如何应对产能过剩?

➤ 作为后起工业化国家，日本积极推进产业升级，促进了战后经济的高速发展，同时也引发了产能过剩的矛盾，即实际产出水平明显低于潜在生产能力。另外随经济周期性波动，萧条与衰退带来的需求萎缩同样也会导致产能相对实际产出的显著富余。对此日本通过市场的自我调节以及产业转移、政策引导等方式展开治理，最终取得一定成效。



资料来源：产业政策化解产能过剩的国际经验与启示——以美国和日本钢铁产业为例，太平洋证券研究院
注：左轴为产能利用率数据，指数以2010年为基期

04 产业结构升级与转移中的困境

如何应对产能过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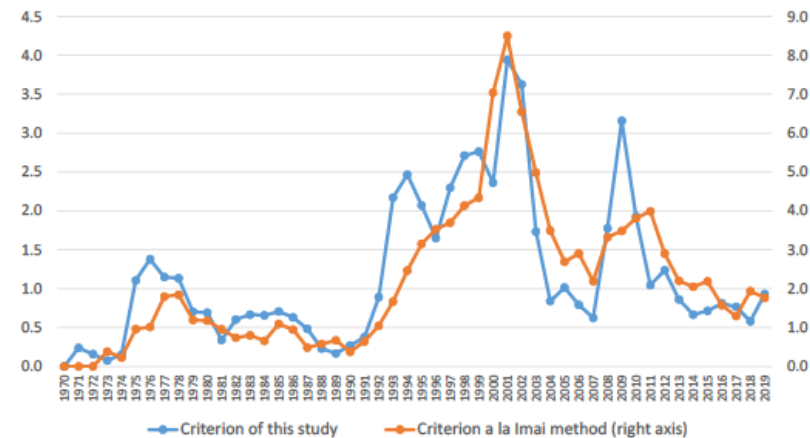
- 二战后至90年代期间日本对于产能过剩问题的处理较为成功，不同阶段处置方式的侧重也有所区别。
- 20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日本主要采取扩大内需尤其是刺激民间消费来缓和周期性产能过剩的矛盾。上世纪50年代中期全球主要资本主义经济体投资热情高涨，日本经济由战后修复步入腾飞阶段。但这一繁荣在1957年开始降温，生产过剩引发美国经济危机并对当时高度依赖出口的日本产生外溢性影响。由此日本推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启动内需主导的发展模式，试图以内需尤其是民间消费来消化部分产能。该计划同时追求经济高速增长、国民生活水平提高以及充分就业这三个目标，并且其实施也取得了良好效果。1961—1970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达到10%，超出计划目标的7.8%，其中民间消费对于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多数时间都超过五成。
- 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则通过淘汰落后产能、引导企业业务调整、加快海外产业转移来释放过剩产能。为解决经济高速增长后的产能过剩，日本从供给侧出发提出对应方案。对内，政府采取系列措施削减过剩产能。具体包括提出设备注册制度限制设备新增、指定准入标准、淘汰落后设备等。到了80年代后期，政策着力点转移至特定企业，重点推动企业放弃亏损业务，引导其兼并重组。当然为保证政策效果，上述去产能过程中，政府会提供一定激励。比如给予税收和低息贷款优惠推进限产保价、政府出资收购过剩的报废设备、提供废弃设备补贴鼓励退出等；对外，日本鼓励企业增加海外投资缓解产能过剩。考虑到国内经济增长中枢下移，消费市场难以消化过剩产能，因此日本大规模对外投资，既开拓了海外市场作为新的承接主体，向外转移生产能力的过程本身也加速了过剩产能的去化。
- 从过剩设备处理完成率上看，上述一系列去产能的举措取得了一定效果。20世纪80年代初期，各特定萧条产业的过剩设备处理完成率平均达到95%。

04 产业结构升级与转移中的困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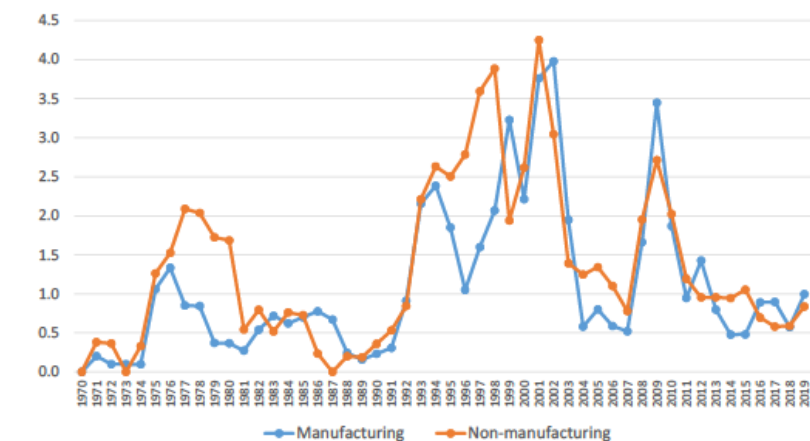
如何应对产能过剩？

- 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同样陷入产能过剩的困境，除此之外还涉及债务过剩、劳动力过剩的问题，日本也进入了新一轮化解过剩产能的阶段。
- 这一时期的产能去化政策集中于特定企业的业务调整。不过由于这一时期日本所处的宏观环境相对复杂，当局初期并未充分把握经济运行的关键矛盾，有效政策的推出历经一定波折，整体去化过程也相对漫长。
- 21世纪之前，政府着手于需求的刺激与受困企业的救助，但部分企业短期根本不具备偿债可能性，仅依靠银行贷款维持日常经营，这些“僵尸企业”加剧了银行不良资产的问题，并且拖累了整体生产效率。
- 随着日本国内金融风险不断暴露，官方意识到“僵尸企业”的危害。21世纪初小泉政府上台，致力于解决这一问题以恢复产业活力。具体而言，政府提出金融再生计划，设立产业再生机构处理不良债权问题，推动缺乏竞争力的企业退出市场。
- 跟踪僵尸企业占比的变化，可以发现1989年日本企业中僵尸企业比率仅为5%以下，后随着泡沫经济崩溃，僵尸企业比率逐渐抬升，由1990年的个位数上升至2001年的两位数水平；而从2002年开始，得益于政府有关企业重组、生产效率提升等方案的推进，僵尸企业比率开始下降，到2007年下降至11%左右。

僵尸企业比率的演变(基于企业数量, %)



僵尸企业比例在各行业的演变(基于企业数量,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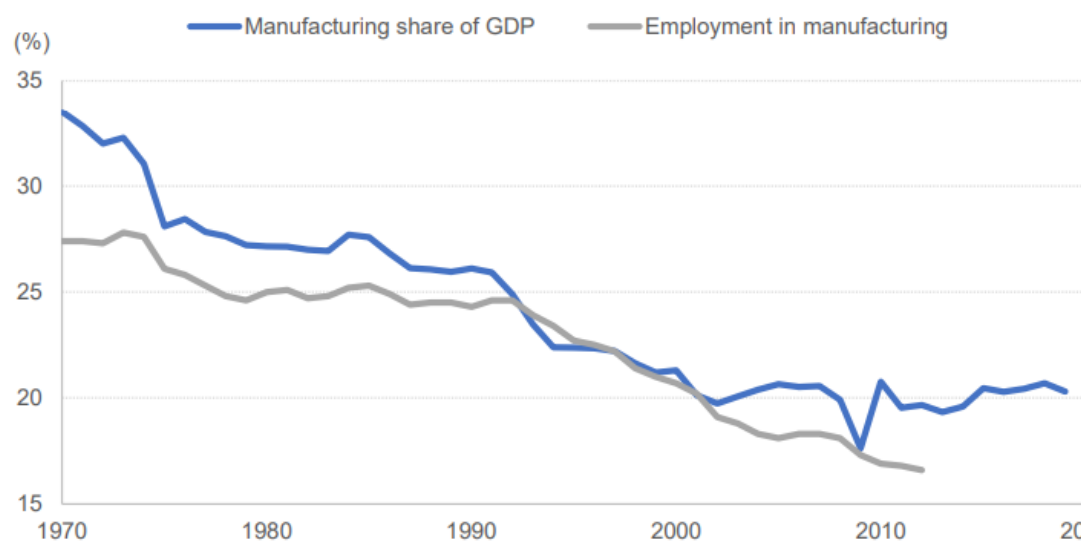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A 50-year history of “zombie firms” in Japan, 太平洋证券研究院

04 产业结构升级与转移中的困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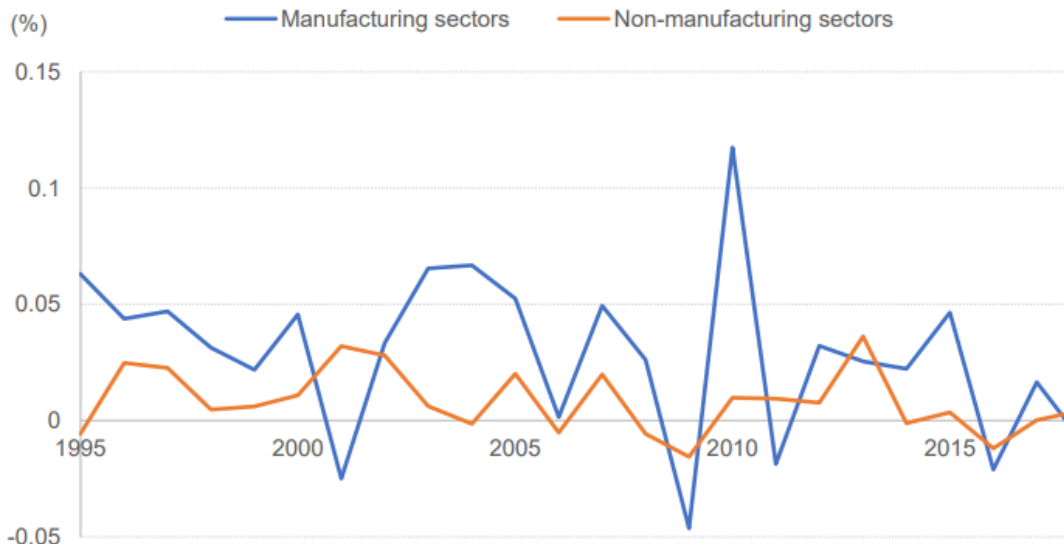
如何处理产业空心化？

- ▶ 80年代后半期日本海外直接投资发展迅猛的同时，对于日本产业空心化的担忧也愈发浓重，至90年代该现象进一步加剧，即随着大举对外投资及国内制造业核心地位弱化，日本本国就业岗位流失、制造业国际竞争力下降，继而导致实体经济丧失长期增长基础。

制造业占GDP和就业份额的变化



制造业和非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增速



资料来源：An Empirical Analysis on Japan's Industrial Hollowing Out, 太平洋证券研究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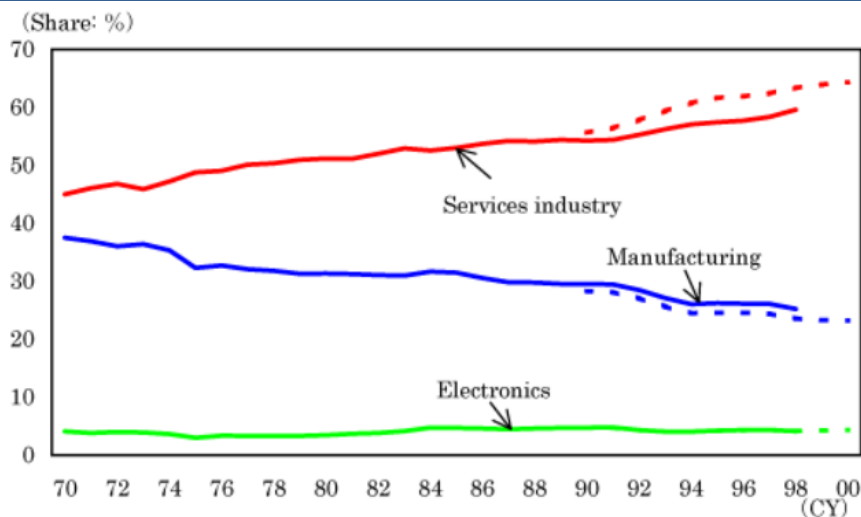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An Empirical Analysis on Japan's Industrial Hollowing Out, 太平洋证券研究院

04 产业结构升级与转移中的困境

如何处理产业空心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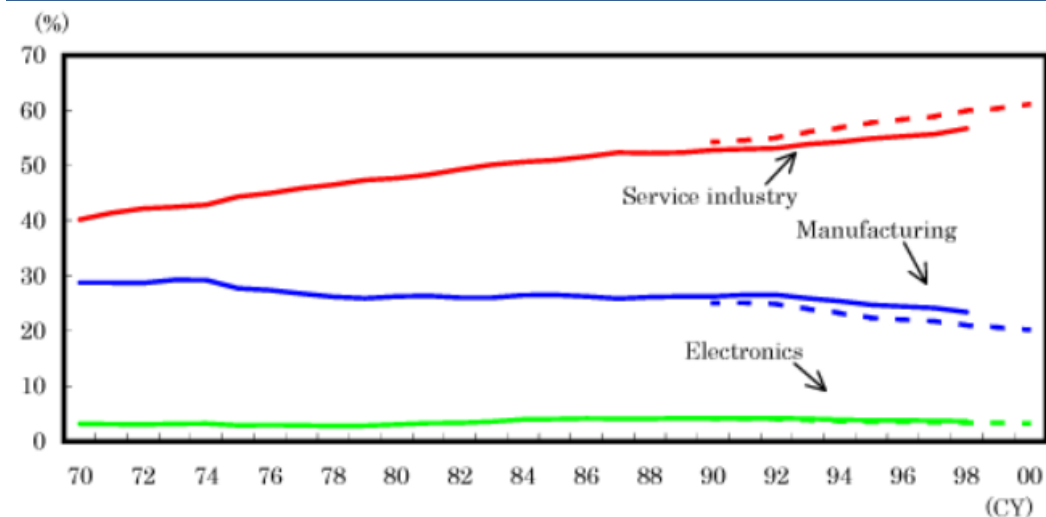
- ▶ 多项指标反映有关产业空心化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以制造业在名义GDP和就业中所占比重、制造业海外生产投资情况以及贸易品竞争力为判断标准，可以看到在70年代完成工业化之后，日本产业以及贸易发生由制造业向非制造业的结构性变化。
- 第一日本制造业在名义GDP和就业中所占比重不断缩小，服务业则不断扩大。制造业在名义GDP中的比重在1970年代达到30%以上，1990年跌至30%以下，2000年不及25%。相比而言，非制造业在名义GDP中的比重持续上升，其中服务业比重从1970年的10%左右上升到接近20%；而在就业人员吸纳方面，制造业的就业比重从1970年代的约27%下降到1990年的约24%，到2000年下降到约20%。另一方面，服务业的就业比重则从1970年代的约15%上升到2000年的28%左右。

名义GDP占比



资料来源：日本内阁府，太平洋证券研究院

就业人数占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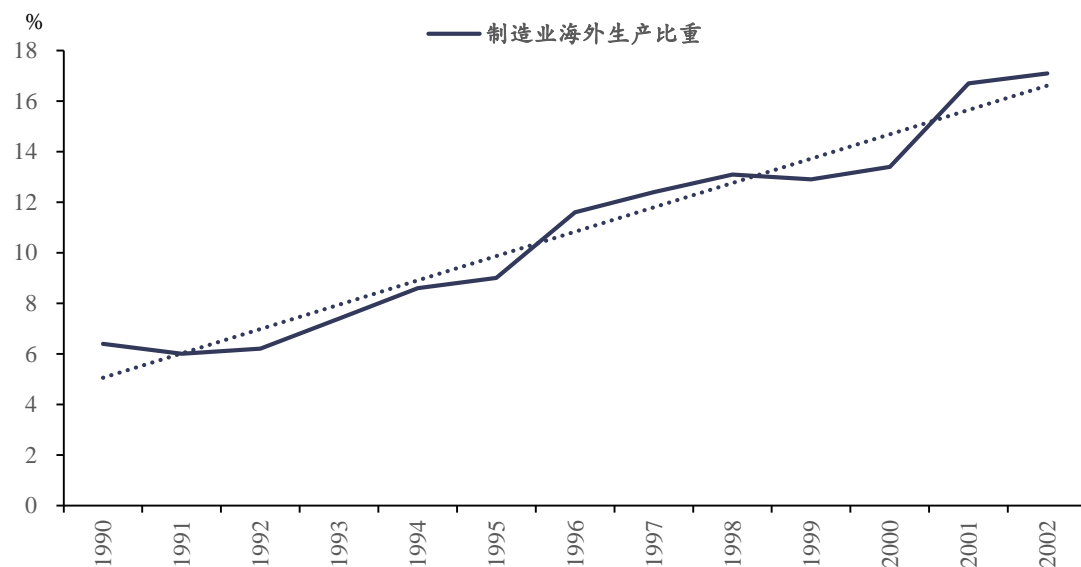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日本内阁府，太平洋证券研究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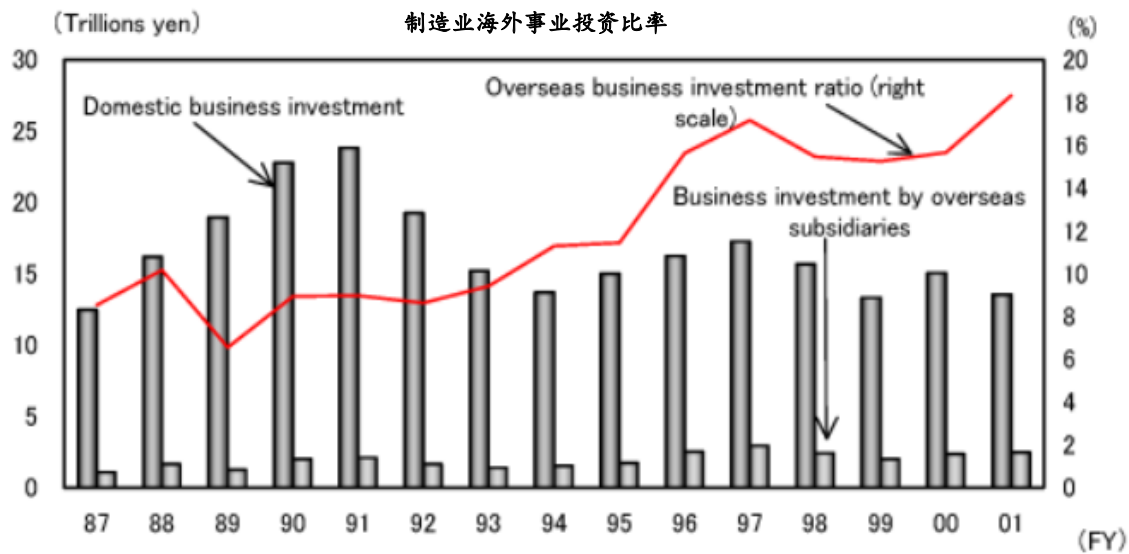
04 产业结构升级与转移中的困境

如何处理产业空心化？

- 第二日企海外生产份额扩张。**制造业海外生产的份额在1990财年为6.4%，自1993财年起一直保持上升趋势。2000财年升至13.4%。此外制造业海外事业投资率也有所上升。除了母公司的直接投资用作内部储备资金外，日本海外子公司还利用从当地银行借款、当地经营利润等海外筹集的资金进行事业投资。从包括自筹资金实施的投资在内的海外子公司投资与国内总投资的相对规模来看，这一比率亦有上行。



资料来源：日本经济产业省，太平洋证券研究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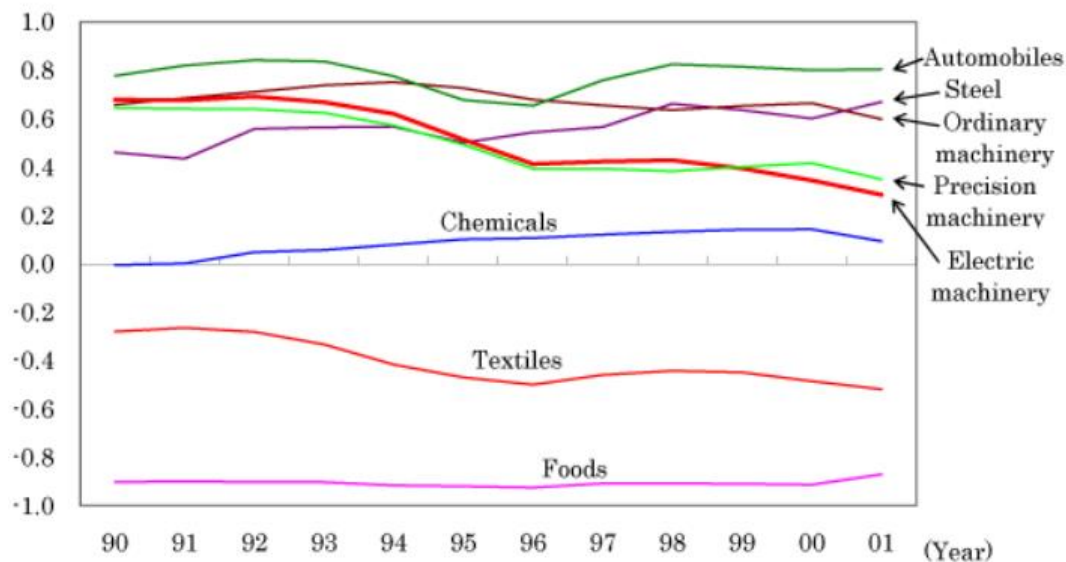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日本内阁府，太平洋证券研究院

04 产业结构升级与转移中的困境

如何处理产业空心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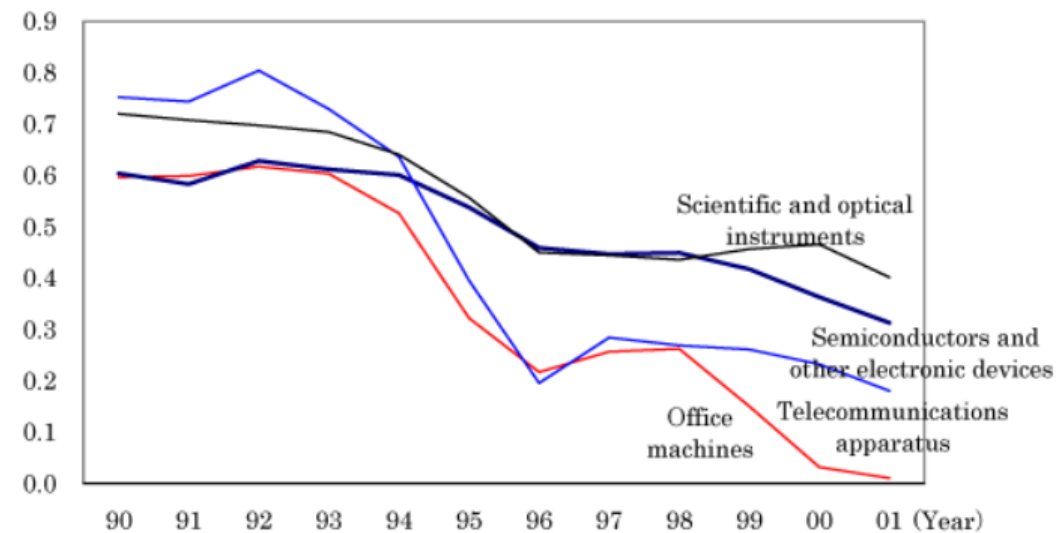
- **第三日本贸易优势品国际竞争力下降。**根据日本内阁府在日本经济与财政年度报告2001-2002中的估算，上世纪90年代日本具有比较优势的贸易品（以电机为代表的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国际竞争力逐渐减弱，表现为其贸易专业化系数不断下降。该指标是指每种商品的贸易差额与对外贸易总值之比，比值范围为-1(完全进口)到+1(完全出口)，比值越接近区间上限的+1，商品的国际竞争力就越强。

各类别产品贸易专业化系数



资料来源：日本内阁府，太平洋证券研究院

信息技术相关产品贸易专业化系数



资料来源：日本内阁府，太平洋证券研究院

04 产业结构升级与转移中的困境

如何处理产业空心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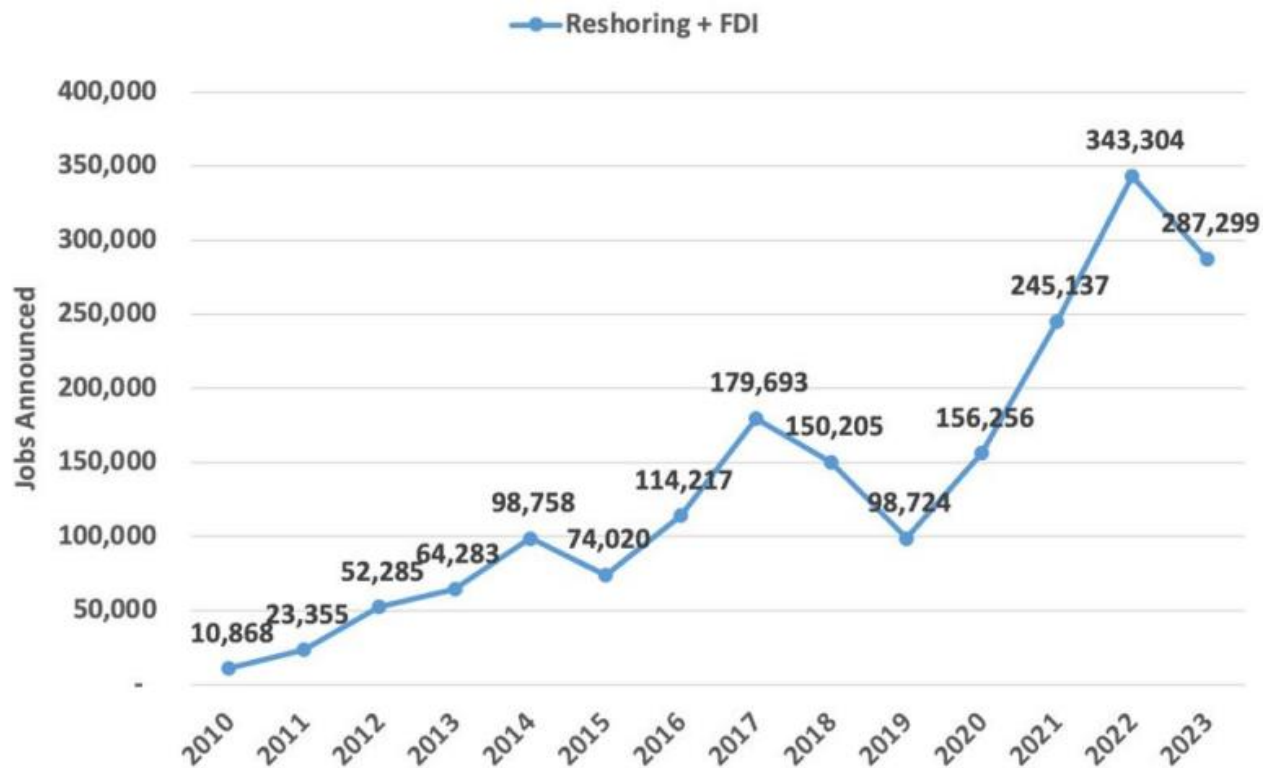
- 关于日本产业空心化的成因，可以从多角度理解。既可将其看作对一国产业结构演变规律的顺应，也可视为对内外环境变化作出的综合应对。一则，伴随一国经济发展，其产业结构往往会发生三大产业地位的调整，具体表现为由第一产业占主导地位到第二产业占主导地位，再到第三产业占主导地位；二则，面对日元汇率升值、对外贸易摩擦激化、国际分工结构调整、人口老龄化等现实环境的变化，日本政府积极推进产业结构调整无可避免。
- 产业空心化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并非全然积极或消极，但外界关注日本的产业空心化，相当部分其实是担忧该趋势的负面效应。伴随着制造业持续向外转移，短期就业及长期经济增长潜力可能均受冲击。
 - 一则，结构调整包含着失业率上升的成本。制造业吸纳了一定就业人员，因此制造业的转移对应着原有就业岗位流失，再加上海外制造业竞争力走强可能通过返销抢占国内市场份额，这将进一步抑制相关企业的就业容量。制造业无法就业的劳动者需要转移至其他行业，如果非制造业无法提供足够多的新就业机会作为替代，失业率可能有所抬升。
 - 二则，未来经济增长潜力有走弱风险。日本经济战后经济的腾飞离不开制造业的引领，随着资本支出以及研发投入的增加，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出现显著增长，是附加值增加的重要支撑。相比而言，非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增幅则较低。在这种背景下进行资源由制造业向非制造业的重新配置，可能会带来经济增长潜力下降的压力。

04 产业结构升级与转移中的困境

如何处理产业空心化？

- 对于产业空心化的纠偏日本政府犹豫徘徊。
 - 当产业空心化的消极影响不断暴露，制造业出现过度超前的萎缩，去工业化偏离合理轨道，这时候往往需要采取系列措施进行矫正以重新确立制造业与非制造业之间的关系，这一过程被称为“再工业化”。
 - 以美国的产业经验为参考，上世纪美国在工业化进程完成之后又陆续推进“去工业化”、“再工业化”政策。20世纪50年代起美国迫于成本及资源等方面的压力，开启了“去工业化进程”。至20世纪70年代末，产业空心化问题严重，制造业的衰落叠加服务业对于经济增长贡献有限，美国步入“再工业化”阶段，后历经多次变革，1980年提出复兴传统制造业、扶植新兴工业等政策理念，21世纪金融危机后为振兴制造业、鼓励制造业回归，美国颁布系列法案（《制造业促进法》和《振兴美国制造业和创新法》等），此外也不乏对外加征关税等激进措施。

美国企业因制造业回流及外商直接投资公告的新增就业岗位



资料来源：Reshoring Initiative 2023 Annual Report，太平洋证券研究院

04 产业结构升级与转移中的困境

如何处理产业空心化？

- 相比而言，日本的再工业化则不够灵活果断。日本工业化的节奏落后于欧美且表现出一定的“错位”特征，欧美“去工业化”进程的起步对应着日本“工业化”的开始，而日本的“去工业化”则与美国“再工业化”大致同时启动。因此作为工业化的后发者，日本在推动产业结构调整时部分借鉴了欧美国家的政策经验。
- 但在追随过程中，日本却表现得相对僵化迟缓。一则政策在“去工业化”与“再工业化”之间摇摆不定，方向不明。日本上世纪70年代后迈入“去工业化”阶段，彼时美国推行“再工业化”政策，也吸引了日本模仿。因此日本推出的产业举措兼具“去工业化”与“再工业化”的政策特征。一方面注重经济重心由工业向服务业的转移，另一方面也寻求制造业内部结构的升级，比如提出对新型材料、机器人等新兴产业的支持。二则面对技术革新浪潮反应迟钝，错失制造业振兴良机。即便日本认识到应该学习美国振兴制造业，而所追随的美国也多次调整升级其“再工业化”战略，日本还是没有迈出坚实步伐。新世纪互联网时代，政策重心的摇摆叠加僵化的企业制度、对无益于市场需求的指标的苛求，导致日本制造业遭遇阶段性危机，产业空心化加剧。
- 上述表现差异可能与美日各自经济体制有关。美国实行的是自由市场模式，市场为主要驱动。而日本体制中计划导向型特征更为明显，政策对于产业结构调整干预更强，这也非常考验执政政府对于经济前景的判断以及对经济规律的理解。一旦把握不到位，形成不合适的人为政策导向，反而会推动经济朝着不正确方向发展。

风险提示：

- 历史复盘疏漏。
- 不同经济体制度差异。



研究院

中国北京 100044

北京市西城区北展北街九号

华远·企业号D座

投诉电话：95397

投诉邮箱：kefu@tpyzq.com

重要声明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具有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530000757165982D。

本报告信息均来源于公开资料，我公司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负责准备本报告以及撰写本报告的所有研究分析师或工作人员在此保证，本研究报告中关于任何发行商或证券所发表的观点均如实反映分析人员的个人观点。报告中的内容和意见仅供参考，并不构成对所述证券买卖的出价或询价。我公司及其雇员对使用本报告及其内容所引发的任何直接或间接损失概不负责。我公司或关联机构可能会持有报告中所提到的公司所发行的证券头寸并进行交易，还可能为这些公司提供或争取提供投资银行业务服务。本报告版权归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所有，未经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制、刊登。任何人使用本报告，视为同意以上声明。